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戰略與國際事務在職專班

碩士學位論文

一帶一路倡議下
中國對中亞哈薩克能源外交戰略研究

China's Energy Diplomacy Strategy to Kazakhstan Unde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指導教授：朱新民 博士

研究生：張瑀恩 撰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7 月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摘要

中國大陸是一個能源消耗大國，現今中國石油有一半以上非由陸路運輸，皆須由海運方式從中東、非洲等地區進口，而進口的石油約 80%是通過新加坡控制的麻六甲海峽，而美國等大國亦藉著控制控制麻六甲海峽的航運通道，進而對東亞經濟、軍事發展產生掣肘，故石油運輸的脆弱性實為石油安全的主要困局。因此中國大陸為確保能源的需求保障，就必須從新的戰略全域高度，制定新的石油戰略，採取積極措施確保國家能源安全 。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是中國主動應對全球形勢變化、統整國內成長和國際合作兩大面相所作出的戰略決策，是因應中國發展新時期周邊外交的重要戰略佈局，藉由「絲綢之路經濟帶」推進中國與周邊沿線國家全方位合作的共同發展事業。這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就是推進中國與周邊沿線國家的能源合作，尤其以中亞能源大國哈薩克最為重要，也是「一帶一路」戰略推進的一個面向。鑑此，在深入了解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地區能源形勢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現狀基礎上，構建能源合作的大通道和能源合作機制，對於中國增加與「一帶一路」周邊沿線國家的能源合作強度，以保障中國未來的能源安全，是具有一定的決策的輔助價值。

關鍵字：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推進、戰略決策、能源形式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目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
第二節　文獻檢閱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 17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9
第五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20
第二章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與演進 22
第一節　古絲綢之路與發展 22
第二節　中國與中亞沿線的關係 26
第三節　一帶一路倡議與演進 30
第四節　小結 34
第三章　中國能源安全與中亞能源通道 36
第一節　中國的油氣供應來源 38
第二節　中國能源安全目標導向 39
第三節　中亞地區的地緣安全 43
第四節　小結 46
第四章　中國與哈薩克的能源合作與安全戰略 48
第一節　哈薩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外在威脅 48
第二節　中國與哈薩克的能源合作歷史進程 51
第三節　中國與哈薩克的戰略合作 54
第四節　小結 58
第五章　結論 61
第一節　研究發現 61
第二節　研究展望與建議 64
參考文獻 72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自 1947 年美國提出「杜魯門主義」衍生冷戰開始，泛西方國家在美國為首的主導下，對共產世界國家如俄羅斯、中國大陸大陸等太平洋沿海周邊沿線構築了第一島鏈和第二島鏈，原是為了遏阻前蘇聯的東擴，但在 1991 年因蘇聯得解體導致的冷戰結束，國際形勢瞬時發生了不同的變化，美國失去了主要的假想敵，隨之而來的是各地區勢力的興起，美國的對外政策也由傳統上的大國競爭，在 911 之後轉變成了應對地區恐怖主義，因有別於傳統安全威脅，給了國際安全造成不同的威脅。傳統上維護政治和軍事安全為核心的安全觀已不足以維護國家安全，在此情勢下，中國大陸大陸應運了新安全觀，本文也藉由近期中國大陸官方的參考文獻，關注中國大陸在中亞能源、外交、安全及周邊大國關係，並藉由中國大陸與哈薩克的互動，探討現行關注焦點。

一、研究動機

提起能源，一般人首先會想起石油、天然氣等天然資源。伴隨著二次大戰的結束及石化產業的發展，現今世界幾乎沒有與石油無聯繫的問題。在這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阿拉伯半島的石油以其豐沛的的儲量，對世界政治、經濟和軍事均產生深遠的影響，美國貨幣更在脫離了金本位後，創立了所謂石油-美元體系，石油的穩定獲取更成為一個國家發展與否的關鍵，更有甚者，冷戰後在發生的「二次伊拉克戰爭」、「9·11 恐怖攻擊」等事件，以及到現在仍存在的「阿富汗戰爭」，背後也都有石油的影子。因此阿拉伯半島一直存在著美俄交鋒等不穩定因素，因其石油資源問題至今依然存在。

中國大陸大陸自 1978 年改革開放，經濟發展一路向上飆升，且 40 年間未曾遇到如美國般的經濟風暴，到了 2019 年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辦隨著中國大陸大陸經濟力和國際影響的提升，現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國-美國的假想敵。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端看歐巴馬政府時期提出的「重返亞洲」及「亞太再平衡」政策及川普政府於 2018 年 3 月起的中、美貿易戰爭，美國對中國大陸大陸無論是人才、科技、經濟、政治及周邊國家等，都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用以阻撓中國大陸大陸發展及影響力，因而中國大陸大陸的對外政策是必須有另一番作為，2013 年 9 月和 11 月，習近平在哈薩克與印尼分別提出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二十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標誌著中國大陸另一階段地區合作與歐亞大陸發展的嶄新戰略，伴隨著上海合作組織、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峰會，中國大陸大陸正在重新構建一個安全與發展合作網路，而美國對中國大陸大陸的經濟威逼，除技術、經濟的限制外，最大影響即為天然資源的管控，而中國大陸大陸是否可以藉由一帶一路的倡議，突破資源封鎖，即為本篇研究動機。

二、研究目的

2013 年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訪問東南亞和中亞國家時，先後提出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並且制定了這個倡議的戰略性概念。2014 年 3 月 5 日，中國大陸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了計劃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區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目前，「一帶一路」倡議走出了理論設計，戰略規劃的總體框架開始進入務實的合作階段，主要影響鐵路、航空、航海、貿易、石油和天然氣等行業。新的絲綢之路是利用歐亞大陸的路上固有之陸運通道接續向外擴大，遠遠超過中國大陸固有的歷史的規模，貿易模式也是一個新的面貌。從過去加入亞太經合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到近期創立的上海合作組織、亞州開發銀行以及其它體系，中國大陸正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然隨著中國大陸大陸的經濟起飛與和平崛起，本文主要的研究目的，在探討中國大陸大陸因應美國的經濟壓制與戰略威脅下，以能源獲取為例，探討中國大陸大陸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其主要目的與可獲得的成果，並以中國大陸大陸與中亞最大內陸國哈薩克的合作為例，探討與其它國家的合作模式與可能遭遇的威脅。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第二節、文獻檢閱

中國大陸自 1996 年成為原油的淨進口國後，接續於 2017 年進升為全球最大原油進口國，2018 年更超越下日本，成為全球最大的天然氣進口國。因此，如何安全且充裕的獲得如石油、天然氣等能源需求，將成為維持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及軍事等發展不可獲缺的因素。本文將透過整理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演進，探討中國大陸能源戰略與中亞地區安全問題，整理中國大陸對中亞能源外交相關文獻。

一、「一帶一路」倡議背景

隨著「一帶一路」上升為中國大陸的頂層設計，全世界的學術團體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增多，也因此出現了大量研究成果。就現前的研究資料而言，中國大陸學界對「一帶一路」問題主要分為幾個方面：[1]

第一：「一帶一路」提出背景及戰略意義的研究：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初使階段，大多數學者僅對相關問題提出概述性的見解，總體來看，大多數研究從中國大陸內部、國際影響等兩個層面對「一帶一路」提出的背景做了分析，核心觀點主要有「一帶一路」的提出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階段性必然結果、「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西部大開發的延伸、「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應對美國「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 TPP)的產物等。陶堅認為，從中國大陸層面看，「一帶一路」源於中國大陸的內生性經濟需求，這種需求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增速經濟變革的內在需要，二是經濟持續均衡發展的內在需要，三是從內需轉出口的“走出去”需要；從國際層面看，國際社會希望崛起中的中國大陸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作出更多的貢獻。研究同樣從國際、中國大陸國內

[1] 王術森，「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主要安全問題研究」，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17 年，頁 4-18。

DOI:10.6814/NCCU202001412

部兩個層面系統分析，了解「一帶一路」倡議提出的背景。其中，國際背景主要表現在：(1)近期全球經濟發展新的特點，主要為經濟增速、貿易增長放緩慢、全球價格下降、跨境投資總體趨緩等。(2)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區域經濟全球化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潮流。(3)多邊投資貿易規則的調整，區域貿易協定競爭更加激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通過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係協議(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TTIP)、多邊服務業協議(Plurilateral Services Agreement，PSA)等貿易投資協定，推行代表發達國家利益標準的貿易投資規則，使中國大陸等相對落後的國家無法順時加入，從而阻隔中國大陸在全球的擴展的經濟影響力。除國際因素外，「一帶一路」的提出，還考慮了中國大陸內部經濟發展、民族振興、國家安全等多種因素。[2]

「一帶一路」從初始的戰略構想，逐步發展成為中國大陸的頂層設計。在當前全球經濟低迷的情況下，「一帶一路」建設對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發展，乃至地區、全球經濟發展的意義重大。白永秀、王頌吉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對於中國大陸加強區域經濟合作、促進世界經濟發展、保障中國大陸安全戰略、推動中國大陸經濟重心西遷、優化中國大陸城市和人口佈局等，均具有重大且實質的意義。[3]胡鞍鋼等人則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置，除經濟等重大戰略意義外，還包含國防、能源、邊疆、經貿等多個領域。對中國大陸內部而言，「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有利於縮小東、西部間的發展，進而推動區域間的經濟均衡發展；對外來說，有利於促進亞、歐等各國家間互通互聯的經貿發展，推進區域安全合作，維護周邊和平與穩定。[4]「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報告 2014」從八個方面較為全面地闡述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對中國大陸內政、外交的戰略意義，主要表現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促進了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營造多極化趨勢下的國際經濟發展和

[2] 連輯，范鵬，段建玲，「一帶一路戰略導讀」，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 年，頁 59-72。
[3] 白永秀，王頌吉，「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縱深背景與地緣戰略」，改革，2014 年 3 月，頁 71-73。
[4] 胡鞍鋼，馬偉，都一龍，「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內涵、定位和實現路徑」，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 2 月，頁 4-5。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平環境、提高全球經濟的開放度及包容度、搭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戰略平臺、推動中國大陸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推動中國大陸東、西部經濟協調均衡發展、維護中國大陸安全與穩定、保持中國大陸經濟相對快速增長態勢。[5]可以說「一帶一路」倡議對中國大陸內政外交的戰略意義重大。

第二：對「一帶一路」戰略內涵、空間分佈的研究。

在「一帶一路」提出的初期，大量研究對其內涵進行了界定，主要是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界定。如王志遠從「經濟地理和對外戰略」兩個面向，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進行解讀。他指出，在經濟地理學意義上，「經濟帶」是指交通運輸幹線銜接的城市集群，可發揮產業聚集和輻射的功能。[6]胡鞍鋼等人從分析「絲綢之路」的歷史出發，指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在古代絲綢之路概念基礎上，形成的經貿合作升級版，主要範圍包含中亞經濟走廊、環中亞經濟帶及亞歐經濟帶三個層段。[7]白永秀、王頌吉認為，從空間範圍來看，「絲綢之路經濟帶」可分為核心區、擴展區、輻射區三個層次。具體而言，「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核心區，是以「上海合作組織」和「歐亞經濟共同體」的主要成員國為主，其包括中國大陸、俄羅斯和中亞五國等；擴展範圍是「上海合作組織」和「歐亞經濟共同體」的其它成員國及觀察員國；輻射區域包括西亞、歐盟等國家和地區，並可連通日本、韓國等東亞國家。[8]「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報告 2014」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一個動態演化的概念。從「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發展模式出發，「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在各國達成發展前提下，依託著高速鐵路等現代化交通技術，並以亞歐大陸橋等交通互聯為基礎，通過貿易、貨幣等方式，提高沿線各區域的市場潛力，促使產業集聚與轉型，以實現各自發展與共同繁榮的帶狀開發開放和發展模

[5] 馬莉莉，任保平，「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報告 2014」，北京，中國大陸經濟出版社，2014 年，頁 17-23。

[6] 王志遠，「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國際背景、空間延伸與戰略內涵」，東北亞論壇，2015 年 5 月，頁 31-34。

[7] 胡鞍鋼，馬偉，都一龍，「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內涵、定位和實現路徑」，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 2 月，頁 2。

[8] 白永秀，王頌吉，「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縱深背景與地緣戰略」，改革，2014 年 3 月，頁 67-68。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式。杜德斌、馬亞華從時間和空間兩個維度，分析了「一帶一路」的地緣內涵戰略。他們認為，「一帶一路」在空間走上與亞歐大陸橋以及中國大陸西行遠洋航線重合，並把世界三大經濟板塊中的兩塊—西歐和東亞—緊密地連接了起來。[9]在「一帶一路」的空間分佈方面，王志遠做了較為系統的研究。他首先分析了當前「絲綢之路經濟帶」空間延伸的三種方法，即「線路走向」、「國家構成」和「網路分佈」等。第一種「線路走向」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可以有三條線路，在空間走向上，初步形成北線---以歐亞大陸橋為主、中線---以石油天然氣管道運輸為主和南線---以跨國公路為主。這三種方法，提供了「絲綢之路經濟帶」主要的運輸方式，雖然在空間的走向上比較清晰，但卻忽略了國際貿易往來及區域經濟合作的範圍界定。第二種「國家構成」的方法，基本上是以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時所講的「覆蓋 30 億人口規模」[10]為依據，這種演算法只是估計了「絲綢之路經濟帶」所依託的基本框架，而不是它最終的邊界。第三種「網路分佈」的方法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實質上，是由歐、亞大陸空間內，各國互利合作的網路，應當以中國大陸為出發點，俄羅斯和中亞地區為橋樑，歐洲為落腳點，北部非洲係為延長線。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空間延伸，主要是從中國大陸南海出發，穿越麻六甲海峽後，依次經過孟加拉灣、阿拉伯海、紅海、蘇伊士運河和地中海。[11]以上路線構成了「一帶一路」的外部輪廓。

第三：對「一帶一路」合作基礎的研究。

這類研究主要從「國家關係」、「經貿聯繫」、「互通互聯」、「合作共識」等五個角度，對「一帶一路」的合作基礎進行研究。鄒嘉齡等人根據貿易相關資料，分析了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依賴關係及中國大陸各省(市、區)出口對其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表示，中國大陸與「一帶一

[9] 杜德斌，馬亞華，「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復興的地緣大戰略」，地理研究，2015 年 6 月，頁 1006。

[10] 這 30 億人口的具體構成大致如下：中國大陸 13 億、俄羅斯 1.4 億，中亞 6000 萬，印度 12 億，巴基斯坦 2 億，伊朗 7500 多萬，阿富汗 3000 萬，白俄羅斯 1000 萬。

[11] 王志遠，「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國際背景、空間延伸與戰略內涵」，東北亞論壇，2015 年 5 月，頁 27-30。

DOI:10.6814/NCCU202001412

路」沿線國家貿易聯繫緊密，相互依賴加深。[12]這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中國大陸周邊沿線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的經濟基礎。惠甯、楊世迪認為，資源、產業、技術和交通等領域互補，對亞、歐等國家建設亞歐大陸橋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合作的基礎。[13]馮維江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的中國大陸內部與國際基礎進行了考察，從中國大陸內部基礎看，雖然各省(區市)參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積極性很高，但各省區之間的競爭將影響「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實施。從國際基礎看，雖該倡議所面臨的壓力和挑戰很大，但區域內主要國家對「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理解和贊同多於對此倡議的疑慮。[14]王海運、孫壯志等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具有良好的人文、政治基礎。首先，「絲綢之路經濟帶」是古絲綢之路在當代再次傳承和復興；其次，當今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發展下，各國間的聯繫和相互依存已較以往更加緊密，各國經濟聯繫不斷強化；最後，雙邊政治關係的提升，亦為各國合作提供了基礎。[15]

第四，對「一帶一路」合作內容的研究。

這類研究主要對「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基礎設施建設」、「能源合作」、「安全合作」、「貿易與投資」、「人文科技交流」等領域合作進行分析。如「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報告 2014」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中，所提的基礎設施的互通互聯、產業合作、能源合作、投資合作、貿易合作、旅遊合作、物流合作、科技合作、文明與文化交往、教育合作等 10 個領域合作進行了研究[16]。龐昌偉對中國大陸與中亞及俄羅斯的能源合作進行了分析，認為能源合作

[12] 鄒嘉齡等，「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格局及其經濟貢獻」，地理科學進展，2015 年 5 月，頁 598-605。

[13] 惠甯，楊世迪，「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內涵界定、合作內容及實現路徑」，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4 月，頁 63-64。

[14] 馮維江，「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當代亞太，2014 年 6 月，頁 73-98。

[15] 王海運等，「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背景、潛在挑戰和未來走勢」，歐亞經濟，2014 年 4 月，頁 15-16。

[16] 馬莉莉，任保平，「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報告 2014」，北京，中國大陸經濟出版社，2014 年，頁 30-32。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突破口[17]。‘惠甯、楊世迪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涵蓋政治、金融、電信、科技、交通、能源、農業、旅遊等領域。能源與安全、交通基礎設施、貿易與投資、科技、文化與旅遊等領域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主要內容。[18]董鎖成等人對「一帶一路」沿線的交通運輸情況進行了研究。他們認為，「一帶一路」的交通運輸體系是實施的重要基礎，是沿線各國設施聯通、貿易暢通、民心相通的紐帶和橋樑。[19]高志剛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下，新疆地區與周邊國家能源與貿易互聯互通的情況進行了研究，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為新疆地區與周邊國家，尤其是與中亞五國能源與貿易合作提供了契機。[20]「一帶一路」涉及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領域，總體是以習近平所提的「五通」為主，其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為基礎。

第五：對「一帶一路」面臨風險與挑戰的研究。

這些風險和挑戰主要包括「大國博弈」、「安全形勢嚴峻」、「文化差異」等。薛力認為，中美實力地位的變化，將使兩國關係表現為既合作又為競爭，因此，「亞太再平衡戰略」與「一帶一路」之間，仍有競爭乃至對抗的一面。[21]何茂春、張冀兵認為，當「絲綢之路經濟帶」給中國大陸社會經濟發展帶來機遇的時，亦面臨一系列挑戰。首先，「絲綢之路經濟帶」提出初期，帶有明顯戰略構想性質。因此，其制度化建制是需關注的問題；其次，「絲綢之路經濟帶」跨度大，涉及地區和國家繁多，在基礎設施建設規劃中，不僅面臨高山、大河等挑戰，還面臨由跨越不同國家而產生的文化問題，這對決策者的智慧是一種考驗；最後，「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建設，還需要處理好如邊境管

---

17 龐昌偉，「能源合作：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突破口」，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 2 月，頁 11-18。

18 惠甯，楊世迪，「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內涵界定、合作內容及實現路徑」，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4 月，頁 64-65。

19 董鎖成等，「一帶一路交通運輸業格局及對策」，中國大陸科學院院刊，2016 年 6 月，頁 663-668。

20 高志剛，「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下中國大陸(新疆)與周邊國家能源與貿易互聯互通研究構想」，開發研究，2014 年 1 月，頁 46-50。

21 薛力，「美國再平衡戰略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 年 5 月，頁 56-73。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理、安全保障等問題。[22] “巴殿君認為，「一帶一路」面臨經濟、政治、安全等方面的挑戰。從經濟方面來看，「一帶一路」的設計，係基於參與方「共贏的觀念」，這種「共贏」的利益，短期內並不明顯；從政治方面看，「一帶一路」能否順利實施，取決於沿線國家的地緣政治關係，具體為政治利益、政治觀念及國家政權穩定問題；從安全方面看，「一帶一路」面臨嚴峻的安全形勢。除上述挑戰外，巴殿君還從國際關係角度，分析「一帶一路」面臨的考驗，具體表現為：相關當事國的風險、美國構築「新型大國關係」的考驗、歐盟發達國家關係重建等。[23] ‘杜德斌、馬亞華認為，中國大陸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中，可能遭遇四大戰略風險：美國的戰略反制、周邊區域大國的戰略制衡、地區民族宗教問題、沿線國家對中國大陸戰略誤解等。[24]

第六，對「一帶一路」合作現狀、趨勢以及政策建議的研究。

薛力、楊雷認為，「一帶一路」倡議在成為正式的制度安排後，必將形成國際制度。而且，「一帶一路」體系制度一旦建成，將會長期有效，並造福沿線國家，成為新型國際秩序的主要內容。[25]巴殿君認為，「一帶一路」建設不僅會帶動相關國家的合作，亦可能加劇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但總體而言，「一帶一路」建設將促進亞太地區、乃至全球經濟的健康、均衡發展。實現經濟利益共贏，將是今後「一帶一路」進程的主要方向。邵峰認為，針對「一帶一路」風險與挑戰，應堅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原則；以雙邊經濟合作為主、對外援助為輔；維護市場運作原則，遵循市場規律及國際通行規則，最後，他提出了應對「一帶一路」風險與挑戰的五項具體措施，主要包括：加強沿線國家的風險評估、利用現有合作機制、強化與沿線國家的安全合作、維護中國大陸海外人員及企業的安全和利益、推動中國大陸軍事力量和執法

[22] 何茂春，張冀兵，「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國家戰略分析—中國大陸的歷史機遇、潛在挑戰與應對策略」，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 年 3 月，頁 10-12。

[23] 巴殿君，「一帶一路，小能高估風險也小能無限誇大作用」，中國大陸網，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 — 2_142792.htm1

[24] 杜德斌，馬亞華，「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復興的地緣大戰略」，地理研究，2015 年 6 月，頁 1008-1010。

[25] 薛力等，「一帶一路：中外學者的剖析」，中國大陸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17 年，頁 34-35。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力量以和平的姿態走出去等。[26]

國際間對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的研究，其關注點與中國大陸有很大不同。一般來說，國際間對「一帶一路」的研究著重於「一帶一路」基本定義等問題。總體來看，國際間對「一帶一路」與自身的關係問題的研究，主要分為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一帶一路」性質的研究。

歐洲亞洲研究所(The European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 EIAS)研究員 Theresa Fallon 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在歐亞大陸的偉大戰略(Grand Strategy)，這將對歐亞大陸的地緣政治格局產生極大影響。「一帶一路」的三個主要驅動因素為能源、安全和市場，這三個因素相互作用，促成了沿線地區、國家的交通走廊和港口設施聯通，最後達到「發展貿易」、「保障安全」、「實現戰略滲透(strategic penetration)」的目的。[27]保加利亞的索菲亞國家經濟和世界經濟大學(University of National and World Economy, Sofia)助理教授 Antonina Habova 透過國際間對「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國大陸馬歇爾計畫(China's Marshall plan)」、「歐亞大陸支點(pivot to Eurasia)」還是「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觀點分析，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國大陸改變現有世界秩序的一種手段。中國大陸崛起將對國際關係和全球政治格局產生重要影響，唯不能用泛西方世界的價值觀來解讀，中國大陸崛起是有其自身的成長邏輯。中國大陸會希望看到國際體系的逐漸改變，而不是妄想去推翻它。中國大陸會用自己的方式改變現有「遊戲規則」。[28]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教授 William A. Callahan 認為，「一帶一路」既是中國大陸的國內政策，亦是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一帶一路」先具有經濟性，它以興建基礎設施，促進周邊國家的貿易和投資。然而，「一帶

[26] 邵峰，「推進一帶一路，既小能無所顧忌也小能因噎廢食」，中國大陸網，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 ― 0_145220.htm1

[27] Theresa Fallon, “The New Silk Road: Xi Jinping's Grand Strategy for Eurasi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2015, pp. 140~147.

[28] Antonina Habova,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hina's Marshall plan, pivot to Eurasia or China's way of foreign policy”, *KSI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SOCIETY*, 2015, PP. 65~70.

DOI:10.6814/NCCU202001412

一路」最終希望建立一個以中國大陸為經濟、政治、文化、安全網路的中心。這一戰略的最終目標是用中國大陸式的治理觀念、準則，重塑歐亞大陸的地區秩序。[29]在當前的研究中，持這一類觀點的學者居多。

英國大學(University of Surrey)學者 Michael M. Du 認為，「帶一路」戰略，將促進了沿線地區和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其目的是在歐亞建立一個自由、開放的市場體系。這一戰略目的將不可避免與美國、俄羅斯、日本、印度等在該地區的利益產生衝突。[30]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East Asian Institute)學者黃朝翰(John Wong)和黎良福(Lye Liang Fook)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國大陸新經濟外交「New Economic Diplomacy」。[31]世界經濟論壇(WEF)供應鏈與運輸行業主管 Wolfgang Lehmacher 和供應鏈與運輸社區主管 Victor Padilla-Taylor 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大陸的「全球經濟戰略(Global Economic Strategy)」。[32]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訪問學者 Christine R. Guluzian 將中國大陸的「新絲綢之路」倡議稱為「多國的商業計畫(a multistate commercial project)」。[33]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大陸代表處首席代表 Robert Wihtol 認為，自「一帶一路」提出以來，伴隨著「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等新型金融機制的建置，中國大陸已逐漸改變現有的全球金融架構(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34]

第二，「一帶一路」對相關國家認知問題的研究。

國際間對「一帶一路」的認知研究，既涉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如俄羅斯、印度、中亞五國家等)的認知，亦涉及域外國家(如日本、韓國、美國

---

[29] William A. Callaha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New Eurasian Order”,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PP. 1~4.

[30] Michael M. Du.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ontext, Focus, Institutions, and Implic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2016, PP. 30~43.

[31] John Wong, “Revivi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China's new economic diplomacy”, *East Asian Policy*, 2014, PP.5~15.

[32] Wolfgang Lehmacher and Victor Padilla-Taylor, “The New Silk Road-Idea and Concept”, *ISPSW Strategy Series: Focus on Defens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5, P.4.

[33] Christine R. Guluzian, “Making Inroads: China's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 *Cato Journal*, 2017, PP.135~147.

[34] Robert Wihtol, “Beijing's Challeng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Georgetown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2015.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等)的認知。俄羅斯國立大學東方研究院(Department of Oriental Studies, Transbaikal State University)學者 Tatyana V. Kolpakova 和 Tatiana N. Kuchinskaya 認為，當前中國大陸正在實行一種「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策略，通過政治、文化、經濟等策略，實現一種「軟」的經濟擴張(a " soft " economic expansion)。中國大陸的「新區域主義」堅持相互不干涉的原則，通過多個國家之間的一體化，挖掘新經濟潛力，其最終目的是追求世界多極化。「絲綢之路經濟帶」是中國大陸「新區域主義」的具體表現。雖然「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歐亞經濟聯盟存在競爭關係，但中、俄建立在共同發展的戰略基礎上，其協作夥伴關係必將促進地區一體化，促進中俄國在中亞地區乃至亞太地區的合作。[35]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學者 Marlene Laruelle 認為，從長遠看，當「一帶一路」涉及到文化層面的問題時，中亞國家對普遍持中國大陸悲觀的想法。因古代歷史發展，中亞國家對中國大陸有著很深的不信任感，認為中國大陸在中亞野心十足。即使少數持樂觀態度的群體，認為中國大陸在中亞的政治、經濟存在，維持了中亞地區的穩定，但這些人在文化層面上並不親中。而且，這些專家認為，中亞和中國大陸需要在文明之間保持距離(civilizational barrier)，因為，一旦中亞陷入中國大陸文化的影響，其民族將自此消亡。但是，文化上的恐懼並不能改變現今中亞國家領導人的實用主義立場。對他們而言，參與中國大陸在該地區的經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no choice" strategy)」。與西方以及俄羅斯相比，中國大陸是中亞國家更可靠的選擇。[36]日本築波大學(University of Tsukuba)學者 Timur Dadabaev 通過分析中、日、韓三國對於「絲綢之路」的不同認知，提出「絲綢之路」戰略的背景和內容，會隨著時代和國際環境的變化而不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絲綢之路」的概念，已經從一個歷史貿易路線，變為一系列社會建構

[35] Tatyana V. Kolpakova and Tatiana N. Kuchinskaya, “China's New Regionalism as a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China in the Global Integration Processes: An Example of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Issues*, 2015, PP.109~115.

[36] Marlene Laruelle, “The Chinese Silk Road and their Reception in Central Asi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Looking West: China and Central Asia"*, http://www. uscc. gov/sites/default/files/Laruelle07o 20Testimony_3.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的產物，「絲綢之路」戰略被不斷塑造、想像和解釋。也就是說「絲綢之路」並不是外交政策原則，而是在敘事領域(the realm of narration)不著邊際的策略(a discursive strategy)。對不同的國家而言，存在著不同的敘事，因此就產生了「我者」與「他者」的差別。對韓國而言，…「絲綢之路」戰略意味著鐵路基礎設施建設；對中國大陸而言，「絲綢之路」戰略是實現這一地區政治、經濟、安全等目標的手段。[37]

二、中國大陸能源安全與挑戰

2008 年美國發生影響世界經濟發展及價值觀深遠的次貸風暴，當年新任總統歐巴馬上臺後，在外交戰略上採取了有別於以往重歐輕亞的政策，上任後次年即進行亞洲訪問，走訪日本、新加坡、中國大陸及韓國，並多次強調他是「美國第一位太平洋總統」（America’ s First Pacific President），進而推出「重返亞洲(pivot-to- Asia)」政策38，代表著美國強勢回歸亞洲的決心，也代表著美國在外交戰略上採取了有別以往的態度[39]。

為展現回歸亞洲的積極作為，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2 年提出「再平衡」（Rebalance）的概念，五角大廈並於同年公佈「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21 世紀國防的優先任務」報告，針對亞太地區進行的再平衡，美國必須擴展與亞太地區新興盟邦如越南、菲律賓等國的合作網絡絡，以確保集體能力及維護共同利益的能力[40]。

有別於美國強勢的回歸亞州，時任中國大陸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2013 年分別在哈薩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一帶)」及印尼提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路)」兩個倡議，故有了「一帶一路倡議」的說詞，隨後在中國大

---

[37] Timur Dadabaev, “Silk Road" as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engagement strategies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7.

[38]Mike Allen, “America’s first Pacific president”, **POLITICO**, Nov., 13, 2009,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09/11/americas-first-pacific-president-029511。

[39]黃介正，「歐巴馬亞洲行與美國亞太戰略轉型」，**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12 期(2009 年 12 月)，頁 1。

[40]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U.S. DoD, 2012), pp.2

DOI:10.6814/NCCU202001412

陸第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建設開放型金融機構，加速與周邊國家和區域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和海上絲綢之路建設，用來形成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41]。

綜觀「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基礎上是參照前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執政時期推動「西部大開發」計畫，配合胡錦濤執期的「中部崛起」戰略[42]等，重新檢討及整理後，提出跨國界向中亞國家延伸的戰略方案，同時也整合了胡錦濤時期為了突破能源運輸的「麻六甲困局」[43]，而採取的印度洋「珍珠鏈戰略」[44]，重新定位一份重要的上位戰略規劃[45]。

伴隨著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如何有效且安全的獲取石油等天然資源，即為中國大陸大陸在 21 世紀發展的主要關鍵項目，當今石油安全的內涵包含有幾個要素，第一：合理的價格、第二：穩定、安全的供應、第三：需求保障。中國大陸大陸在短短的 30 年裡，伴隨至著經濟快速發展，石油消費增長幅度驚人，而未來的經濟增長，同樣離不開充足的石油資源的支撐。

綜觀中國大陸大陸的石油、天然氣進口來源主要來自中東、亞太及非洲這三個地區[46]，為尋求穩定、安全的供應，中國大陸大陸採多元的進口的方式，擴大來源，此有利於石油、天然氣等供應的安全。惟考量世界主要石油、天然氣產區多集中於中東國家，所以在採購的依存度上很難避免對其地區的依存，由於傳統美俄勢力的介入，中東地區一直存在著戰亂及宗教派系等不

[41]「一帶一路」，**維基百科**，2019 年 10 月 19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5%B8%A6%E4%B8%80%E8%B7%AF#cite_note-3。

[42]「中部崛起戰略」，**MABlib 智庫**．百科，2017 年 1 月 10 日，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8%AD%E9%83%A8%E5%B4%9B%E8%B5%B7%E6%88%98%E7%95%A5。

[43]石洪濤，「能源安全遭遇麻六甲困局」（2014 年 6 月 13 日），**人民網**，2016 年 5 月 12 日，http://www.people.com.cn/GB/gouji/14549/2570978html。

[44]「中國大陸『珍珠鏈戰略計劃』：租借港口是為了包圍印度？」，**The New Lens 關鍵評論**，2018 年 8 月 12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1529。

[45]「【能源雜誌特約】反思中亞管道若干問題」，**THE GLOCAL**，2019 年 10 月 21 日，https://theglocalhk.com/%E5%8F%8D%E6%80%9D%E4%B8%AD%E4%BA%9E%E7%AE%A1%E9%81%93%E8%8B%A5%E5%B9%B2%E5%95%8F%E9%A1%8C/。

[46] 陳俊瑞，「中國大陸大陸石油安全問題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44。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安全因素；而次要進口來源的亞太地區，主要是來自如印尼，越南等國，但進口數量已逐年下滑，惟近期由於中、美戰略鬥爭互動頻繁，中國大陸對俄羅斯的依賴度已逐年升高，在今(2019)年 12 月 2 日更完成了中國大陸、俄羅斯之間第一條輸往中國大陸的天然氣管線運營，此意味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將更加緊密；第三大地區為非洲地區，如非洲地區的蘇丹、安哥拉等，但由於進口非洲石油仍須經過美國控制的麻六甲海峽，在戰略安全上，仍存在著風險。

張文木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大陸大陸國家安源利益分析」中提出，即使在全球化的時代，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也脫離不了對如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的利用與依賴[47]。隨著中國大陸大陸對進口石油等天然資源依賴度的加深，其國家安全利益也將受到影響。石油所衍生的石化產品，既是國計民生不可缺的需求，同時也是重要的軍事戰略資源，端看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搶奪的東南亞橡膠資源，即可看出石化產業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所以當中國大陸大陸在現階石油、天然氣等尚未完成穩定安全的獲的條件下，也就代表著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利益被牽制及束縛，最嚴重的情況，還會影響到國家的整體發展及對外政策。就好似 1973 年由以色列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所引發的石油危機期間，美國、歐洲、日本甚至台灣的石油政策影響甚大。所以，中國大陸的石油、天然氣等資源安全獲得問題，不僅僅是中國大陸大陸關注的問題，也將成為世界石油安全的一部分，亦將是中國大陸大陸外交戰略必須考慮的重點部分。

中國大陸石油安全的另一個困局，就是石油運輸的脆弱性，也就是所謂的「麻六甲困局」[48]：現今中國大陸石油有一半以上非由陸路運輸，皆須由海運方式從中東、非洲等地區進口，而進口的石油約 80%是通過新加坡控制的麻六甲海峽，而美國等大國亦藉著控制控制麻六甲海峽的航運通道，進而

[47]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大陸大陸國家安源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頁 71。
[48]查道炯：「中國大陸石油安全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當代世界出版社**，2005 年版，第 203 頁。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對東亞經濟、軍事發展產生掣肘。故有“誰控制了麻六甲海峽，誰就扼制住了東亞的能源通道”的認知，因此中國大陸大陸為確保能源的需求保障，就必須從新的戰略全域高度，制定新的石油戰略，採取積極措施確保國家能源安全[49]。

相較於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大陸的能源儲備體系建設現仍屬於初期建設階段。以石油儲備為例，目前美國的石油儲備可供使用 95 天，日本 123 天，相較中國大陸只有 50 天[50]。這意味著在國際石油鏈條發生重大危機的時候，中國大陸的能源安全將非常脆弱，中國大陸為了執行石油進口多元化目標，已和若干石油生產國如南美洲的委內瑞拉、中亞的伊朗、非洲的蘇丹等簽訂能源協定，但些許國家因為與美國際間交政策相違背，故被美國列為恐怖主義國家，這也將導致美國際間交報復與經濟制裁，由於中美國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不同，近年來更藉由臺灣問題、香港問題、南海問題及新疆問題等要脅中國大陸大陸，進而對其能源運輸安全有嚴重的威脅及挑戰。

三、中地區安全問題亞

中國大陸大陸為了突破「麻六甲海峽」的封鎖，2006 年 4 月完成從哈薩克到新疆的全長 1,800 公里的輸油管線[51]，希望總工程未來能達到 5,000 萬噸的輸出能力[52]。配合著環裏海地區油氣開發，周圍地區如亞塞拜然、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均可藉此進入到中國大陸大陸，如再增建到伊朗等地區，其全球石油儲量第二的地位，更可將中東和中亞的石油由陸路方式導入中國大陸大陸，擺脫海運的不利情勢。然中亞地區國家傳統上屬俄羅斯的勢力範圍，加上美國也一直努力的在阿富汗等中亞地區增加影響力，如近 2003 年美國總提供哈薩克 9,200 萬美元援助，承諾幫助其維護裏海安全，為此所做

[49]石洪濤：「中國大陸的“麻六甲困局”」，**中國大陸青年報**，2004 年 6 月 15 日，第 1 版。
[50]IEA(2010), Oil Market Report, Aug. 11, 2010。
[51]「哈薩克石油明日抵達中國大陸阿拉山口」，**中國大陸評論通訊社**，2006 年 4 月 29 日，http://hk.crntt.com/doc/1001/3/4/0/100134076.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134076
[52]郭博堯，「中國大陸大陸石油安全戰略的轉折」，**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4 年 8 月 10 日），頁 5。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的回收，自然是能要求哈薩克針對由英國 BP 公司所主導開發的巴庫-提比裡斯-傑伊漢管線上要採取積極的態度[53]，亦代表著美國勢力深入了中亞地區。

中亞五國包含了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及土庫曼，都屬中國大陸的近鄰，現今中亞地區主要面臨的問題，有關安全威脅的部分，大體可分為宗教極端主義[54]、民族主義衝突[55]、邊界領土爭議[56]、稀缺水資源掠奪[57]等，隨著一帶一路的推進，如果中國大陸大陸要能安全穩定的獲得能源需求，勢必在與中亞五國得合作上有不同的戰略。

第三節、研究方法

中國大陸大陸 2013 年提出跨國「一帶一路」係指「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經濟活動（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其主要參考中國大陸近千年歷史上的陸上及海上對外貿易行經，其運營模式包含了整個亞洲內陸及周邊沿海地區，因此，本文在研究方法方面，將參照中國大陸絲綢之路的歷史發展，採用「歷史研究法」加以整理及分析；另參照中國大陸大陸在 2013 年後與各經貿區「對接」的活動，採「文獻分析法」比較分析參與方與反對者的立場，從中瞭解中國大陸大陸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價值。

一、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是以歷史作為研究的材料瞭解過去並預測未來。「歷史研究法」是研究過去所發生事實的方法，並以科學的態度收集材料，進行檢驗

[53] 關健斌，「中國大陸衝破美國阻力 中哈石油管道建設重入正軌」，**中國大陸互聯網**，2004 年 9 月，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4/Sep/665071.htm。
[54] 何希泉，「中亞變局中的民族宗教問題」，**現代國際關係**，2005 年 2 月，頁 15。
[55] 陳聯璧「中亞五國的民族關係問題」，**世界民族**，2001 年 2 月，頁 31-32。
[56] 張娜，吳良全「費爾幹納盆地的飛地問題——對 20 世紀 20-30 年代中亞地區民族-國家劃界的反思」，**世界民族**，2013 年 1 月，頁 30。
[57] 楊恕，王婷婷「中亞水資源爭議及其對國家間關係的影響」，**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 5 月，頁 53-54。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和證實，再透過系統的整理和解釋，以憑藉過去的經驗，對未來的發展做有效的推測[58]。

審視中國大陸大陸「一帶一路」的建構及發展演變來看，2013 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經歷了從前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執政時期推動「西部大開發」計畫，配合胡錦濤執期的「中部崛起」戰略準備，到習近平完成戰略構想，最終成為國家頂層設計的過程，其推演方式與中國大陸歷史發展脈絡是否有雷同之處。此外，因應中國大陸大陸的和平崛起，冷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也將受到影響，故中國大陸大陸如何建立新的安全觀來因應國際秩序，勢將參考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脈絡，規劃中國大陸大陸甚至整個東亞的新安全觀。

迄 2019 年 10 月底止，中國大陸大陸已經與 137 個國家和 30 個國際組織簽署了 197 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檔[59]，歷史上，有關中國大陸各朝代與其域外國家的經濟貿易活動，比較有規劃的紀載，大致可追朔到西漢張遷通西域以後，至唐朝時的長安，已被認定為當時最具規模的國際化都市，現在中國大陸大陸參考歷史經驗，再次推動這跨區域的一帶一路倡議合作構想，因涉及地區和國家眾多，更有威脅美國所推動的海上經濟貿易及戰略圍堵等既有國際秩序的建置，當前中國大陸大陸如果想要持續和平崛起的發展，勢必對現有的國際貿易體系及當前安全局勢有很大的變化，因此本文將用中國大陸歷史與西方歷史的角度，對中國大陸大陸與中亞地區的能源合作分析比較。

二、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主要目的在於瞭解過去、洞察現在和預測未來，經過分析蒐集內容後歸納統整，再分析事件的淵源、原因、背景、影響及其所隱含的結

[58]「歷史研究法 historical method」，**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 年 10 月，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683/

[59]「已同中國大陸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一覽」，**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網**，2019 年 4 月 12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tm_id=126&cat_id=10122&info_id=77298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構意義等，包括閱覽與整理（Reading and Organizing）、描述（Description）、分類（Classfying）以及詮釋（Interpretation）等四大步驟。文獻分析法的特性包含了文獻分析可超時空的限制，紀錄已發生的社會事實，並可依不同人的經驗與視野，研析他人經驗判斷，以及提供詳實可靠的背景資料[60]。

隨著中國大陸大陸的和平崛起，泛西方世界為首的美國，勢必對其有所反制及阻擾行動，現中國大陸大陸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否足以為其未來發展制定新安全觀，當前世界主要經濟體對中國大陸大陸的說詞是否足以表現其價值，本文將分別以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的三個時期的西向政策，摘述其發展演變及對中國大陸大陸能源戰略規劃。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中國大陸歷史淵遠流長，自春秋戰國時代起就有國家發展需求，然發展至各個時期，都有不同的外部因素幹及擾及限制其國家發展，如漢時的匈奴、唐時的突厥、宋時的遼、金、西夏及蒙古等，近代如美國建國初年，也受限於大英帝國的制約而無法突破，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才逐步擺脫大英帝國而壯大。

中國大陸大陸自 1978 年改革開放開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等發展逐步壯大，迄今(2019 年)已有一定的規模和實力影響國際社會，因此逐漸引起傳統大國如美國的警示，開始逐步利用已掌握的國際機構及秩序來限制其發展，本次研究範圍，將探討中國大陸大陸如何利用「一帶一路倡議」的戰略規劃，確保國家發展所需的石油、天然氣等能源能安全穩定的獲得，並

[60]「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2016 年 8 月 22 日，https://www.sunnyswa.org.tw/12345/189-%E6%96%87%E7%8D%BB%E5%88%86%E6%9E%90%E6%B3%95%EF%BC%88document-analysis%EF%BC%89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整理出其所面臨的風險困境。

二、研究限制

一個國家的能源安全戰略，包含了對國家內部的能源運用，儲存和管理，對國家軍事、經濟、民生等方面，側重於能源運用及結構調整；對外的戰略則著重於能源的穩定、安全及有效的獲得。對外獲得方式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直接攸關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政治安定與軍事規畫，其戰略目標與對國家內部息息相關，如僅有國內能源戰略規劃而缺少對外能源戰略，是不能應對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國競爭的。本次研究探討的面向，將參考中國大陸歷史的經驗教誨，情針對中國大陸大陸如何利用「一帶一路倡議」戰略背景下，突破現有國際秩序管控下的經濟發展，然考量「一帶一路倡議」合作對象及發展規模各有不同，故本文僅以中國大陸大陸與哈薩克的能源經濟合作模式為例探討，此為本次研究的限制。

第五節、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本務研究主題為「一帶一路倡議探討中亞能源外交戰略安全-以哈薩克為例」，在研究內容方面，首先將從歷史的角度，說明一帶一路在中國大陸歷朝歷代的演進與發展，並對中國大陸大陸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戰略規劃背景及國際現況加以說明，在從中亞地緣關係剖析中國大陸大陸與其能源外交戰略安全，最後就本研究選定中國大陸大陸與哈薩克的合作態樣，綜合研析「一帶一路倡議」所面臨的地緣政治優勢與風險，提出研究發現及後續建議方案。內容分為五個章節，說明如次：

第一章為緒論。章節安排分為研究動機與目的、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範圍與限制及說明研究架構及章節安排等。第二章探討「一帶一路」的歷史演進與中國大陸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現實背景，首先回顧絲綢之路的歷史發展與機遇，在就中國大陸大陸在和平崛起的條件下，所面臨的外在威脅與發展限制，並分析中國大陸大陸自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所建立的一系列合作架構所面對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的國際疑慮，最後研析美國以「亞太在平衡」、「重返亞洲」及「印太戰略」等政策，說明其聯合日本、澳洲及印度後之戰略圍堵對中國大陸大陸造成的安全問題做出小結。

第三章將導入「一帶一路倡議」戰略規劃，與中國大陸大陸能源安全獲得方式進行對接，首先說明中國大陸大陸能源獲得來源與面臨的主要威脅，並分析能源安全與中國大陸大陸的國家安全觀，續就軍事圍堵、經濟制約等問題與「一帶一路倡議」所提陸上絲綢之路戰略，其化解方案與安全威脅對中國大陸大陸的影響，最後再分析中亞地區所面臨的主要威脅與地緣政治現況。

第四章為本文的核心，將依中國大陸大陸與中亞五國中，地域及資源最豐富的哈薩可為例，說明中國大陸大陸與之合作的經濟發展與能源分佈等結構框架，首先說明哈薩克的經濟發展模式，再說明中國大陸大陸與之經濟合作方式與威脅，並以此合作模式說明中國大陸大陸如何利用在中亞地區能源獲得，突破美國的圍堵政策。

第五章為結論，內容包括中國大陸大陸如何利用「一帶一路倡議」接續和平崛起的發展之路，並就中國大陸大陸將與哈薩克合作的方式，研析可能面對的地緣政治風險與應對策略進行歸納分析。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第二章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與演進

2013 年 9 月初，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首次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自此「一帶一路」倡議提出 7 年多來，「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越來越多國家的回應，隨著「一帶一路」沿線各區域國家的投資規模增大，關乎於沿線國家的經濟、文化、社會環境等要素的多樣性和世界政治、經貿格局的多變性，使得我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面臨諸多風險。然而「一帶一路」建設從無到有、由點到面，至全球 10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共同參與，截至 2020 年 1 月底，中國大陸已經與 138 個國家和 30 個國際組織簽署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檔，[1]形成廣泛國際合作共識。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等機制的建立，更為「一帶一路」金融合作提供了重要支撐。可以說「一帶一路」已經成為美國興起泛民族經濟主義後，各方積極參與推進的重要事業。

第一節、古絲綢之路與發展

一、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簡稱絲路）一詞，最初是由德國費迪南·馮·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 年 5 月 5 日－1905 年 10 月 6 日）於 1877-1912 年- 「中國大陸：我的旅行與研究」（China: The results of My Travels and the Studies Based Thereon）系列叢書第一冊中首先提出。[2]一般泛指西漢（西元前 202 年—西元 8 年）時，由當時西漢武帝大臣張騫出使西域後，所開闢的貿易通道，其經歷點從當時的首都長安（今西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後，再連接當時地中海各

[1] 「已與中國大陸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一覽」，**中國大陸一帶一路網**，2019 年 4 月 12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tm_id=126&cat_id=10122&info_id=77298。

[2] 李希霍芬，**中國大陸**，第 1 卷(Ferdinand Richthofen, China, Vol. L,，Einleitender Teil, Rei-mer, 1877)，頁 497-498。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國。基本走向定訂於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隨著近代地理考察和考古發掘，多數研究學者已將”絲綢之路”看作是連接歐、亞大陸各文明間交往路線的概括性總稱。它並非單純的指一條或幾條陸上商業路線，而是泛指以絲綢為主要貿易物品，經連接中亞、西亞、印度、阿拉伯直至歐洲、北非等地的海、陸交通網絡。絲綢之路亦是歷史上橫貫歐亞大陸的貿易交通線，中國大陸是絲綢的故鄉，在經由這條路線進行的貿易中，中國大陸輸出的商品以絲綢最具代表性。自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就將這條陸上交通路線稱為“絲綢之路”，此後，現今中外的歷史學家都認同此說，並沿用至今。

二、古絲綢之路

早在張騫通西域之前，已有部分絲綢經蜀地(今雲南、四川一帶)運至印度，[3]而張騫出使西域的成功，則是推動了絲綢商道的建立，使得相關貿易更能向中亞地區傳播。再者，漢朝廷在張騫通西域後，逐漸認識了除匈奴外的國家（如大月氏、大宛、安息等地），更體認道其地理位置（今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戰略價值。自大宛以西直至安息帝國（今伊朗、伊拉克周邊各地皆善於貿易，但因當時中國大陸王朝知識產權保護的因素，除中國大陸外的國家皆無法生產絲綢等物，故確保天山山脈周邊及塔里木盆地交通的暢通，係攸關中國大陸商隊絲綢貿易的成效。在這樣的貿易環境下，原產自中國大陸的絲綢經過多次轉手貿易，最終運至地中海沿岸國家如羅馬帝國，成為羅馬帝國貴族的爭相競奪的高級品。

張騫通西域後，中外貿易方式正式開使利用了這條從中國大陸通往歐、非大陸的陸上交通要道。這條道路，由當時西漢首都長安出發，經過今甘肅省河西走廊，然後分為兩條路線（如圖一）：第一條由陽關，經鄯善，沿崑崙山北麓西行，過莎車，越過蔥嶺、大月氏，直抵安息帝國；另一條由玉門關，經車師前國，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越過蔥嶺、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漢時遊牧於康居西北即成海、里海北部草原，東漢時屬康居）。

隨著西漢武帝建元二年（公元前 139 年），張騫奉命率領一百多人，從隴西（今甘肅臨洮）出發，河西走廊的地位就躍然於歷史舞台，其地利位置亦成為帶

[3] 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頁 3166。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動中國大陸對泛西方的商貿交流的關鍵所在，西域地區諸國如鄯善、龜茲等紛紛在這時期逐漸出現。而當時的歐洲國家已經出現了“賽裏斯[4]”（Seres，源自希臘語言“絲”，從漢語“絲”的音轉化的“Ser”。）——對中國大陸的稱呼。這種小規模的貿易交流說明在漢朝以前東西方之間已有經過各種方式而持續長時間的貿易交流。

當中國大陸進入東漢時代，由於本身內部民亂不斷增加，加自漢哀帝以後的國勢已無法對西域加以控制，使得西域諸國亦紛爭不斷，如車師國與匈奴多次的戰爭，更使得天山南北路商道難以通行，當時的中國大陸東漢政權的作法，只能關閉玉門關等西部關隘，這些因素最終都導致絲路東段天山北南路的交通陷入半癱瘓狀態。在中國大陸進入魏晉南北朝後，因內部戰亂更迭不斷，加計突厥民族的興起，因此對西域商道的控制已然無法掌握。

隨後，中國大陸迎來繁榮強盛的唐朝，因絲綢之路所衍生的巨大利益，重新引起了中國大陸統治者的關愛眼神。為了重新建立這久經戰亂的商路，當時的唐王朝聯合了西域諸國，一舉擊潰了由突厥王朝所掌控的西域商道的，並藉此深入西域各國的領土範圍，並在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648 年）設置了，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城等安西四鎮，[5]作為當時唐王朝控制西域地界的機構，並打通了天山北路的絲路分線，將絲綢之路的商道延伸至中亞。然而，經過唐王朝在安史之亂後開始衰落，西藏吐蕃越過崑崙山北進，侵佔了西域地域的大部；中國大陸北方地區戰火連年，伴隨著唐以後中國大陸經濟重心逐漸南移，因而相對穩定的南方對外貿易明顯增加，帶動了南方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興盛，四川成都和福建泉州也因此逐漸成為南方經濟大城。

唐末，因北方遼、金、西夏、蒙古等族的興起，導致戰事頻繁多變商道阻礙，直至西元 840 年回鶻汗國的離散，漠北蒙古高原再次陷入了權力真空的地帶。隨著由契丹部族建立的遼帝國的崛起，建立者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對漠北蒙古高原的征伐後，漠北蒙古高原旋為遼帝國所控制。耶律阿保機從漠北蒙古高原南下，西

[4]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中華書局，109 年 8 月 1 日，頁 29。

[5] 張昭遠，「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列傳第一百四十八·西戎·龜茲國，頁 355。

DOI:10.6814/NCCU202001412

越阿爾泰山，兵鋒直達西域各地，建立了“東至東海，西至於流沙（今新疆境內白龍堆沙漠一帶），北達大漠的契丹帝國。[6]控制傳統的從漠北蒙古到西域乃至歐洲的草原絲綢之路的交通線，保障了歐亞商旅要道的暢通。

因北方遼、金、西夏、蒙古等族的興起，導致戰事頻繁多變商道阻礙，加計指南針及造船工業的技術提升，故而海上絲綢之路在北宋時期逐漸迎來了全新的發展。在重文輕武的北宋趙氏王朝帶領下，工商業的發達及人口的增加，興起了經濟規模大幅提升，然傳統的絲路河西走廊段，不管事北宋還是南遷後的南宋，在趙氏王朝的帶領下都無法獲得有效的控制，使得傳統的西北絲路商道衰落，而取而代之的就是南方絲綢之路與海上絲路的開闢。

蒙古帝國的建立者成吉思汗，在統一蒙古諸部的過程中十分注重所到之處的交通要道，以有效的加速軍隊瑙重和人員運輸流動。建立汗國之後，為了更好地整合所屬地域，成吉思汗積極維護傳統的漠北交通線。伴隨著蒙古大軍的西征之路，成吉思汗及其追隨者，不僅將騷站建立成可迅捷傳訊的系統，用以保障戰爭必需的基礎傳訊措施，並將其作為開疆拓土後維護統治的一項重要行政事業。因此，在征服西夏和金國並控制中原地區之後，重新恢復了長城關內經河西走廊至西域諸國的西延伸的交通線，使這條自先秦至唐代中期中、西方世界間的交通幹線絲綢之路重煥生機。[7]

明朝建立在元朝退守中原地區以後，當時明疆域的北部有北元虎視眈眈，西部則是蒙古四大汗國的殘餘勢力，所以西域地區均非屬明朝勢力範圍，當時明朝需要面對的，除了西部的東察合台汗國，還有北元等蒙古汗國的殘餘勢力。直至西元 1406 年永樂年間，明朝政府才在今新疆設置哈密衛。開始對哈密地區進行統治，標誌著明朝勢力延伸到新疆東部。但是，明朝至此以後再也未能向西域更進一步。1529 年嘉靖年間，更是直接撤銷了哈密衛，明朝軍隊退回嘉峪關，就此徹底放棄了西域經營，直到 1759 年，清朝消滅準噶爾汗國，收復新疆全境，中國大陸才再次踏入西域地區，但西域絲綢之路的作用以不復以往重要，地位更因

[6] 脫脫，「遼史」卷二《太祖紀下》，中華書局，1974 年，第 24 頁。
[7] 閏國疆，「蒙元初期的絲綢之路與國家治理」，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 4 月，頁 82。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海上絲路的興起而下降。

應該指出的是，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貿易通道，也是一條文化通道，在空間上是由多條路組成的交通帶，而不是一條線。它在中國大陸和中亞、西亞以及歐洲的文化交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人們熟知的四大發明就是通過絲綢之路傳入西亞、歐洲的，對全世界文明的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實際上，中國大陸不僅向這些地區輸出了四大發明的成果，也輸出了相關的科學思想，這些成果和思想對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二節　中國大陸與中亞沿線的關係

古代絲綢之路，從時間圍度上來看，縱跨歷史約 2000 餘年，大致可區分為先秦、漢唐、宋元、明清等階段，不同得階段對其經營理念也有所不同。另從地理條件亦可區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及海上絲綢之路。從文化角度來看，可區分為農耕、遊牧及海洋文明，文化發展類型繁多。因此，從中國大陸絲綢之路衍發的東西文明交流，亦可將其稱為“人類文化的運河”、“亞歐大陸的動脈”，對人類歷史演進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由此可認知到，無論絲綢之路商業貿易本身的價值，就其涉及的週邊國家、民族和文化構聯來論，絲綢之路所衍生的效益已越過了絲綢之路本身的意涵，這其中扮演東西文明交流通道的中亞周邊諸國，其地理位置尤其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中國大陸與中亞區的民族交流

中國大陸與中亞地區的交流，最早可以追溯自西元前 1000 年的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大陸北方與中亞北部地區文化之間的相互聯繫和影響。從戰國時期的「穆天子傳」，紀錄著周穆王得赤驥、盜驪、白義、逾輪、山子、渠黃、驊騮、綠耳等八匹好馬，進行了一次西至於西玉毋之邦的崑崙山遠行。成為中國大陸與中亞地區交往的一部最古老的傳奇。而到了西漢武帝時代，張騫出使大月氏的中亞地區後，與中亞諸古國建立了直接的聯繫，由此開始了國家與國家間大規模的交流，在兩千多年中國大陸與中亞地區聯繫、交往和相互影響下，促成了民族的交流與融合，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在現今論及中國大陸與中亞地區的關係中，即包含了歷史上的民族遷徙和人口流動形成的民族親緣關係和跨界民族間存在的親緣關係。

審視亞洲历史上，在中國大陸地區与中亚之间曾存在着许多游牧民族，如塞迦人、月氏、匈奴、突厥等。随着历史的推演，这些游牧民族逐漸融入了中国和中亚各民族之中。例如，據「漢書」記載，烏孫國之地本是塞迦人居住地，其王後因被大月氏擊敗，而移居到罽賓、休循、捐毒等地，其部族分散於數國，大致今吉爾吉斯、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伊朗東部，其塞王以罽賓（阿富汗、巴基斯坦）為中心。[8]又如，匈奴在西元前 3 世紀至前 1 世紀、突厥於西元 6 至 8 世紀時都曾是中國大陸當時王朝的重大邊患。匈奴和突厥亦都曾統御過中亞地區，並分別與中原王朝發生戰爭。隨著匈奴和突厥的多次分裂，部分人口歸附於當時的漢朝和唐朝，另一部分則西遷至中亞地區。因此，這些龐大的遊牧民族遺留得人口，在中國大陸北方地區逐漸融入中國大陸的民族中。

西元 13 世紀初，伴隨者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帝國後的三次西征，蒙古帝國在全盛時期，統治的疆域從東亞起，經中亞、西亞、到東歐，蒙古鐵騎所到之處，雖然摧毀了當地統治階層，但也加速了東西方的民族文化與科學技術的交流，促使了民族的融合。絲綢之路所經之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被單一民族控制(元朝於 1271 年建立時，由蒙古人建立的四大汗國實際上互不隸屬，各自為政，且其政治制度也不同。鑑此，元朝視為中國大陸的一個朝代，而四大汗國則不屬於中國大陸。)，這簡化了東西方的商貿往來。大量中亞、波斯各族居民的軍人、手工匠、奴碑、商賈、傳教士等，紛紛與中國大陸進行交流與融合，並滲透到元朝社會各階層。

歷史上，中國大陸與中亞地區民族因遷移和人口流動，對彼此民族結構產生深遠影響的同時，中國大陸西部地區與中亞地區因此產生了 8 個同源民族，他們分別是哈薩克族、吉爾吉斯族(柯爾克孜族)、烏茲別克族(烏孜別克族)、塔吉克族、維吾爾族、俄羅斯族、韃靼族(塔塔爾族)和回族(東幹族)。中國大陸與中亞的

[8] 《漢書》卷 96〈西域傳〉上：「罽賓國……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為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各民族本著共同時期的宗教、文化、歷史、語言背景及密切交往的傳統，在跨民族的交往中，採用和平友好政策，均可促進彼此間的經濟、文化交流。

二、中國大陸與中亞區的經貿交流

中國大陸人是最早發明了養蠶、絲織的民族，在距今 3000 多年間的夏朝，種桑、養蠶、織絲已經在當時中國大陸地區普遍推行了。西漢張騫通西域之後，絲綢開始大批量地出現在西方羅馬帝國的市場。而後“絲綢之路”貫穿中國大陸、中亞和西方的商道，絲綢即被認為是東西方交流中最早的產品，係絲綢之路上運送的最廣泛商品。然而，絲綢向西輸出之前，中國大陸文化發展的歷史上，早就有一種高貴物品出現在社會中，此物為產製西域的崑崙山下，自古就是中國大陸文人雅客所追求的的新疆和闐玉。它正是在東西方之間的古老商道上比絲綢更早出現的商品。這玉石運輸比之絲綢商道，更有其經貿交流史上的貢獻和地位。

先秦時期，中國大陸的絲織品也經由所謂當時綠洲之路輸往中亞。早在西元前 6 世紀左右，這些絲綢製品就從河西走廊進入今新疆地區，再由西域各族輸往蔥嶺以西的中亞地區，該區因此發展成東西商道的交流地。到西元前 5 世紀，中國大陸的絲織品已發現在波斯的市場上。在希臘馬格內夏的銘文中還提到大流士對種植糧食作物感興趣，在大流士時期，原產於中國大陸的桃和杏傳到了中亞。[9]西元前 330 至 250 年，中亞南部地區在希臘人得統治下，其經貿繁榮，商道暢通。因此，戰國時期從中亞地區到西方的商路已經非常通暢了。中國大陸的絲織品可順利的進入中亞市場。

馬的馴養始於中亞，大約發生在青銅時代。中亞地區的遊牧民族，則是最早飼養馬的人。[10]從古至今，中亞一直是世界上優良品種馬匹的主要產地，產於土庫曼聞名於世的“阿哈爾捷金”馬，自古更有汗血寶馬的美稱，更是為土庫曼珍愛和引以為豪的。馬的產量在中原地區在歷史各時期都是匿乏的，更別說是良馬、駿馬。在中國大陸與中亞的關係史上，馬市的交易，一直是對歷史發展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隨著中原地區與西部遊牧民族接觸的頻繁，草原地區盛產的馬匹也

[9] 王治來，「中亞通史，古代卷(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54。
[10] 王治來，「中亞通史，古代卷(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年，頁 9。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可大量的輸入到中原。致使馬匹的運用，在中國大陸軍事技術的發展下，產生了很大進步。

漢代以前，中國大陸與中亞間已有零星的貨物交流，那時中國大陸特有的絲織品、漆器、銅器等，主要是通過遊牧民族間的貨品交換，方將中原的物品傳輸到中亞地區，再從中亞傳輸到西方各國。自張賽出使西域後，西漢武帝積極發展東西方交通道路，中國大陸與中亞之間建立了直接、經常、大量的貿易，自此，中國大陸和中亞各國的商團在這條商道上頻繁往來。中國大陸的絲綢商品源源不絕地輸出到中亞諸國，中亞商團再將其運往西方各國。同時，大量地西方貨物和中亞的物品也來到中原地區，從漢代起“絲綢之路”就成為中國大陸、中亞與西方之間經濟、文化聯繫的橋樑。

唐朝是中國大陸王朝最鼎盛的時期，其疆域之廣、民族之多、國力之盛、文化之繁榮都是當時世界的霸主。這其中尤以唐太宗、高宗、武則天、玄宗在朝的近一百年多間為盛，統治者實行了較寬大開明的政策。西元 658 年，唐帝國征服了盤據西域商道的西突厥後，西域和中亞地區納入唐朝的版圖，在唐朝對西域和中亞地區進行有效統治後，東西方間的交通重新獲得暢達，是以中亞地區的經貿及文化交流，在這時刻產生了對後世深遠的影響。中亞各國向唐朝派遣使者，通過朝貢方式，在八世紀中期以後一直保持著。據「新唐書」記載，高宗曾遣使到中亞各地瞭解風俗民情，並據以繪圖編撰「西域圖志」60 卷。唐朝並在西域設有安西都護府和北庭都護府，因此，中亞地區民族大多數來往，都由兩大都護府統一辦理。

在唐朝這一經濟文化繁榮空前發展的時代後，中國大陸地區進入了分裂割據的五代十國和兩宋時期。這一時期，中原地區與中亞、西亞等地之間的聯繫，因內部複雜的政治形勢及戰亂的頻繁原因而衰敗。尤以在南宋時期漢族政權的衰弱，原有陸上絲路交通與貿易收縮到南方一隅。

元朝為了加強與中亞、西亞及西方的聯繫和交通，在至元十八年(1281 年)開闢了察合臺晉北分地太和嶺至別失八裏的新騷道，全程騷站三十座，成為元廷與中亞察合臺汗國之間、以及通過察合臺汗國與伊兒汗國、欽察汗國以及東歐、

DOI:10.6814/NCCU202001412

西方交通的橋樑。[11]蒙元時期在歐亞地區修建騷路，建設騷站系統，改善了交通條件，對於蒙古統治者的軍事活動和帝國政權的鞏固、對邊疆地區的控制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蒙元騷站系統的建立，交通條件的改善有利於亞歐之間廣泛的經濟、文化交流。為中國大陸和中亞地區的廣泛交流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元朝係有別於唐朝強盛的另一種表徵，在單一民族的統治下， 蒙元時期是中國大陸與中亞地區經貿、文化交流發展的重要時期。伴隨著蒙古人的征服，使其開闢了歐亞廣闊地域與統一的政治空間和民族融合新環境。這時期中國大陸與中亞地區間，大量中亞各族居民遷入中國大陸，對元代社會和中國大陸民族結構產生了影響，也繁榮了東西商道的經貿活動。

明清時期，中國大陸與中亞的交流繼續發展，當時雄踞中亞的帖木兒王朝，始終與明朝保持著頻繁的使臣往來和朝貢體系的貿易關係，但一般商業貿易卻因明朝國策的關係，無法像前朝般熱絡。清代直至中期，清政府方才重新控制了天山南北路商道，中亞部分哈薩克等，與清朝保持了密切的貢使往來和貿易關係。清朝與哈薩克大規模的絹、馬貿易、在絲綢之路南道上的貿易，則是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古絲綢之路貿易最後的繁榮，對當時中亞地區經濟發展和中亞與新疆地區的經濟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三節　一帶一路倡議與演進

一、一帶一路倡議

2013 年 9 月 7 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哈薩克進行國事訪問期間，以「弘揚人民友誼-共創美好未來」的為題，說明了中國大陸對中亞國家睦鄰友好的合作政策，並倡議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將其作為一項造福沿途各國人民的大事業。同年的 10 月 3 日，習近平另在印尼國會，再提出以「攜手建設中國大陸-東盟命運共同體」，提出創建“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倡議。習近平指

[11] 馬建春，「元代東遷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 年，頁 14。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出，中國大陸願同東盟國家加強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國大陸政府設立的中國大陸一東盟海上合作基金，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共同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兩個倡議統稱為「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六年多來，在中國大陸與沿線國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帶一路」建設逐漸取得了成績。

二、一帶一路的演進

2013 年 10 月 2 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與時任印尼總統蘇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會談時提出，中國大陸將提議共同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以下簡稱亞投行)」，用以提供東盟國家等發展中國大陸家，在執行基礎設施建設時，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次年 10 月 24 日首批創始成員國如中國大陸、印度、新加坡等 21 個國，共同簽署了「籌建亞投行備忘錄」。2015 年 12 月 25 日，亞投行正式在中國大陸北京成立。截至 2019 年 7 月 14 日，亞投行共有 100 個正式成員國，其中域內國家 44 個、域外國家 25 個，簽約國 31 個。[12]亞投行成立的宗旨，在通過在基礎設施及其他生產性領域的投資，促進亞洲經濟可持續發展、創造財富並改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同時，與其他多邊和雙邊開發機構緊密合作，推進區域合作和夥伴關係，應對發展挑戰。[13]亞投行是第一個由中國大陸推動設立的國際性金融機構，也是中國大陸正式邁入國際社會所成立的機構，對推動包含亞洲各國經濟體在內的增長及經濟和社會發展有獨特且重要意義，也有助於提升中國大陸地區應對未來國際性金融危機和其他外部衝擊的能力。

在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初期，因亞洲諸國承受了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及 2008 年次貸危機的災難，對由美國控制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WB）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操控全球金融制度的畏懼，很多如東亞及中國大陸周邊沿線國家，對中國大陸創建此銀行的目的和行為抱持有嚴重誤解和疑慮，因此在 2013 年中國大陸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初期，中亞諸國就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沒有明確的時間表和詳細的規

[12]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中國大陸外交部，2015 年 10 月 3 日，頁 36-39。
[13]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中國大陸外交部，2015 年 10 月 3 日，頁 2。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劃路線圖，推動目的讓人質疑。與此同時，中亞國家亦擔心這一倡議可能附有複雜的政治和社會動因。[14]亞投行的成立對「一帶一路」建設意義重大，使周圍沿線國家體認到中國大陸致力於推動歐、亞大陸互聯互通的誠意，消彌參與國的疑慮，有利於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順利實施。

2013 年 11 月 12 日，中國大陸政府將「一帶一路」的概念，納入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意味著「一帶一路」已提升為國家頂層設計。在此設計理念上，國家接續制定了一連串有關「一帶一路」的建設方案及相關機構，致力推動「一帶一路」永續發展。2014 年 11 月 4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八次會議，發起建立亞投行和成立「絲路基金」，以推動亞洲地區經濟發展，同年 11 月 8 日，在北京舉行的「加強互聯互通夥伴關係」，習近平宣佈成立規模為 400 億美元的絲路基金，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建設、開發、產業合作和金融合作等項目與互聯互通有關的專案提供融資。2014 年 12 月 29 日，絲路基金有限責任公司在北京註冊成立。2017 年 5 月 14 日，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宣佈，中國大陸將提高「一帶一路」建設資金，並向絲路基金挹注人民幣 1000 億元。亞洲各國多是發展中國大陸家，普遍缺乏建設資金，基礎設施建設較為落後，嚴重制約了經濟發展。應該說，有了亞投行和絲路基金的存在，使得「一帶一路」相關建設具備了充足的資金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吸引了周邊國家參與的積極性。

2015 年 3 月 28 日，中國大陸國家發展改革委(簡稱「發改委」)、外交部、商務部等，聯合發佈了「推動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簡稱「願景與行動」)，就「一帶一路」倡議的時代背景、共建原則、框架思路、合作重點、合作機制等做了系統闡述。這是第一份有關「一帶一路」的政府政策白皮書，亦可視為「一帶一路」規劃性檔案。「願景與行動」中指出，將重點打造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大陸-中亞-西亞、中國大陸-中南半島、中-巴、孟-中-印-緬等六大經濟走廊。「願景與行動」的提出，使周邊國家及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有了一個全面性清楚的了解，消弭了部分國家的疑慮。與此

[14] Hongzhou Zhang. Build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hallenges in Central Asia [J]. Cambridge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2015.10.3，PP.17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同時，「願景與行動」也為「一帶一路」建設標誌了方向。對於中國大陸內部而言，「願景與行動」指出中國大陸內部地區和省份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定位和優勢，為各省區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建言；從國際方面來說，六大經濟走廊的規劃，為周邊國家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方向，有助於推動中國大陸與周邊沿線各國「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2017 年 5 月，中國大陸在北京舉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這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規模最大的論壇活動。在 2017 年發生英國脫歐談判及川普推動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下，[15]此次「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對於推動國際合作有重大的意涵。29 位外國元首、政府首腦及來自 130 多個國家的約 1500 名貴賓作為代表出席論壇，達成了一系列合作共識、重要舉措及務實成果。主要涵蓋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 5 大類，共 76 大項、270 多項具體成果。

「一帶一路」倡議期目的在通過加強國際合作，聯接各國發展戰略目標，實現互通互補、共同發展。聚焦國際經濟合作的是基礎設施的建設，滿足沿線周邊各國和地區發展的需球。六年多來，「一帶一路」建設已從理念規劃轉化為實際行動，從期望願景轉變為實際現實。習近平總書記並將這些成果總結發表以下五個方面：[16]

第一：政策溝通不斷深化。

「一帶一路」建設注重與相關國家或國際組織的戰略對接及優勢互補。目前，中國大陸已經與多個國家的戰略規劃實現對接，與相關國家的政策對接工作也全面展開。

第二，設施聯通不斷加強

在「一帶一路」框架下，中國大陸與相關國家一道共同規劃實施了一大批互聯互通專案，相關合作穩步推進。目前，中國大陸正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一道，積極規劃中蒙俄、新亞歐大陸橋、中國大陸一

[15] 「2016 年全球經濟回顧與 2017 年展望」，兆豐國際商業銀行，2017 年 2 月 18 日，頁 1。
[16] 王術森，「「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主要安全問題研究」，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17 年，頁 36。

DOI:10.6814/NCCU202001412

中亞一西亞、中國大陸一中半島、中巴、孟中印緬六大經濟走廊建設。這六大經濟走廊的引領下，以陸海空通道和資訊高速路為骨架，以鐵路、港口、管網等重大工程為依託，一個複合型的基礎設施網路正在形成。

第三，貿易暢通不斷提升。

中國大陸同「一帶一路」參與國大力推動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不斷改善營商環境。中國大陸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累計超過 500 億美元。

第四，資金融通不斷擴大。

資金問題是基礎設施建設中面臨的突出挑戰。為解決這一問題，中國大陸與沿線國家做出了諸多努力，開展了多種形式的金融合作，如亞投行、“絲路基金”等，這些新型金融機制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

第五，民心相通不斷促進。

「一帶一路」建設弘揚“絲綢之路”精神，開展綠色絲綢之路、健康絲綢之路、智力絲綢之路、和平絲綢之路等建設，在科學、教育、文化、衛生、民間交往等各領域廣泛開展合作，為「一帶一路」建設夯實了民意基礎。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四節　小結

中國大陸歷史上，與中亞地區的經貿交流主要是以“朝貢貿易”方式進行的。在這兼具政治和經濟意義的交流中，對於中亞諸國的貿易利益，具有強大的內部吸引力。在經歷了不同的歷史時期，中亞與中國大陸的經濟貿易關係一直是該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加上中亞地區位處絲綢之路的樞紐位置，更使其成為東西方商業貿易聯繫的關鍵。中國大陸的絲綢、瓷器、茶葉等民族商品，迄今都是中亞地區商業貿易發展的重要產品。與之同時，繁榮的絲綢之路商業活動，也增

DOI:10.6814/NCCU202001412

進了中國大陸國內產業的不斷升級與發展。

在當今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近二十年友好關係的發展中，經濟交流與合作再次顯露出巨大的生機。中國大陸與中亞地區的經濟互補性和發展經濟合作的“天時、地利、人和”等因素決定了彼此經濟合作的巨大潛力。儘管中國大陸與中亞今天的經貿合作中還存在與某些國家間貿易嚴重不平衡的問題、某些國家法規不健全、投資環境不理想等問題，但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建交以來，在中國大陸與各國的共同努力下，貿易保持著強勁的增長勢頭，中國大陸已成為各國位居前列、最重要的貿易夥伴之一。經濟技術合作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績，尤其是在最近幾年，中國大陸與哈、土、烏等國能源領域合作有力推動了經濟合作的全面發展。貿易和經濟技術合作的不斷發展，再次將雙方的經濟利益密切地交織在了一起。同時，經濟合作關係的發展也促進了中國大陸與中亞各國的關係的全面提升。

今天中國大陸與中亞地區的經濟交流與合作是歷史上絲綢之路經濟貿易關係的延續。如同歷史上的絲綢之路一樣，今天的絲綢之路仍然在互通有無、交流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經濟，傳遞文明，加深友誼。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第三章 中國大陸能源安全與中亞能源通道

提起石油，人們首先會想起的就是中東能源。這是因為，在中東地區，幾乎均與石油有著千絲萬縷的相聯繫的問題，不是起源於石油，就是歸結於石油。在這近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中東的石油以其巨大的儲產量，對世界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產生過大而深遠的影響，西方發達國家以及發展中國大陸家，現今都高度依賴著中東石油的供應。二次大戰後，1 美元/桶左右的中東廉價石油，為西方經濟的繁榮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然而，「成也石油、敗也石油」，發生在 1973 年和 1979 年的兩次中東石油危機，一度使中東石油成為阻礙西方經濟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的毒藥。隨後在上世紀 80 年代發生的「兩伊戰爭」、「阿富汗戰爭」及隨後的「海灣戰爭」，到了本世紀 911 事件後的「阿富汗戰爭」，2003 年爆發的「伊拉克戰爭」等，背後也都受中東石油的影響。因此，中東地區一直存在著許多不穩定因素，其豐富的石油資源深深影響地區穩定。中東豐富的石油與該地區政治不穩定，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世界能源安全問題的癥結所在。世界能源安全發展史上，已數次證明了這一點，但 21 世紀的中東地區，仍將是最主要的世界石油供應來源，也是世界局勢不穩定的地區。

在上世紀 90 年代，中國大陸還沒有感受到中東石油的影響力，但是在 1993 年起，中國大陸成為石油淨進口國，從那後，此種情況有了根本改變。在 2000 年來自中東的石油就已經占中國大陸石油進口總量的半數以上。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發展，對石油需求迅速增長，中國大陸對中東石油進口需求量，也將急劇增長。全球能源研究中心(GGES)提出，雖然俄羅斯和中亞國家能夠提供中國大陸石油，但無論中國大陸做了什麼樣的規劃，大多數石油需求仍將來自中東地區，這就對中國大陸的中東能源戰略提出了挑戰。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大陸未來的石油安全問題乃至經濟安全問題，實質上也將是一個與中東石油密切相關的問題。

國際能源安全歷史顯示，世界能源安全的中心問題是石油，而石油安全的核心是中東，石油作為重要的有稀缺性戰略能源，皆與各大國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局是顯示，誰控制了中東地區，誰就在拓寬自身的發展空間的同時，牽制甚

DOI:10.6814/NCCU202001412

至是控制了競爭對手。世界各大國正是認清了這一點，所以紛紛瞄準中東地區，制定出中東地區的能源安全戰略。因此，各國的戰略利益在此紛繁交錯，對抗、競爭、合作、依賴，各國之間的博弈便在中東地區展開了。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的爆發，加上中國大陸現今已是石油消耗的第一大國，因此，如何有效且安全的獲取石油、天然等資源，即為中國大陸大陸在 21 世紀發展的主要關鍵項目。當今石油安全的內涵包含有幾個要素，第一：合理的價格、第二：穩定、安全的供應、第三：需求保障。中國大陸大陸在短短的 30 年裡，伴隨至著經濟快速發展，石油消費增長幅度驚人，加計中國大陸前陣子喊出中國大陸製造 2025 等目光長遠的國家發展規劃，如何因應未來的經濟增長，同樣離不開充足且穩定的石油資源的支撐。

為尋求穩定、安全的供應，綜觀中國大陸大陸的石油、天然氣進口來源主要來自中東、亞太及非洲這三個地區。[1]中國大陸大陸採多元的進口的方式，擴大來源，此有利於石油、天然氣等供應的安全，惟考量目前中國大陸獲得石油、天然氣多集中於中東國家，所以在採購的依存度上很難避免對其地緣的依賴，二戰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傳統美、俄勢力的介入，中東地區一直存在著地緣戰亂及宗教派系等不安定因素，近期的伊拉克、敘利亞、土耳其，甚至攸關歐洲地區的北溪二號線的建立，都是現今中東地區因石油衍生的地緣混亂；中國大陸目前次要進口來源為亞太地區，主要是來自如印尼，越南等國，但因南海等問題導致國與國之關係不善，進口數量已逐年下滑，進口數量遠遠不能滿足需求。

近期由於中、美戰略鬥爭互動頻繁，中國大陸對俄羅斯的依賴度逐年升高，在 2019 年 12 月 2 日更完成了中國大陸、俄羅斯之間第一條輸往中國大陸的天然氣管線運營，此意味莫斯科和北京之間的戰略合作關係將更加緊密；第三大地區為非洲地區，如非洲地區的蘇丹、安哥拉等，但由於進口非洲石油仍須經過美國控制的麻六甲海峽，在戰略安全上，仍存在著風險。

[1] 陳俊瑋，「中國大陸大陸石油安全問題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44。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第一節、中國大陸的油氣供應來源

自 1979 年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經過近 40 年的全方位發展，中國大陸已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在能源消費結構中，產自中國大陸內部的煤、炭等占能源消費比率超過五成。[2]囿因中國大陸缺少石油、天然氣等天然資源，故油氣人均使用率的占比，均較已開發國家低許多。聯合國氣候大會的研究提出，煤、炭等利用率越高，其資源對環境破壞將越來越大，惟中國大陸的油氣產量早已無法滿足國內發展，囿因經濟發展快速而不斷升高，對外依存度更加提高，考量近期中國大陸周邊地緣政治格局的快速變化，中國大陸能源的安全獲得，勢必箝制中國大陸發展機會。

中國大陸現已成為世界最大的石油進口國，進口的來源區域從周邊國家如俄羅斯，擴展到西亞、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區，近期更向新疆、南海海域等地區進行石油探測。但從近期國際發展的視野來看，世界經濟因美、英等國的政策發展漸緩，經濟民族主義升溫，石油所產生的地緣政治傾向趨於明顯;美國頁岩油革命成功、俄羅斯加入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rganization of the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OPEC)，其石油戰略變革亦將帶動國際能源戰略的調整。從中國大陸國內來看，提升人民逐漸增長的生活需要，亦會導致石油消費逐年提升，需求缺口將不斷增大，石油進口依存度將會持續居高不下。2018 年 3 月 26 日，拖延一年的中國大陸原油期貨(SC)在上海上市，為原有英、美控制的二大原油期貨市場，注人了另一個選擇，引起了美國對中國大陸石油市場發展變化情況的強烈不滿，這同時必將影響中國大陸石油的地緣政治格局。

自 1949 年中國大陸建政以來，中國大陸石油供需變化先後經歷了四個階段。[3]第一階段(1949-1958 年)：中國大陸石油探明量少，石油需求多數依賴進口。第二階段(1959-1970 年)：石油供需基本平衡，石油從進口國轉向為出口國的時期。第

---

[2] 任重遠，「中國大陸能源安全的目標導向評估」，**國際石油經濟**，2017 年 10 月 31 日，頁 29。

[3] 程中海，「中國大陸石油進口貿易的時空格局、發展困境與趨勢展望」，經濟地理，第 39 卷第 2 期，2019 年 2 月，頁 2。

DOI:10.6814/NCCU202001412

三階段(1971-1992 年)：石油產業技術水準提升，產量增大，與此同時，石油需求增速加快，存餘量逐漸下降。第四階段(1993 年至今)：石油供需缺口擴大，進口依存度邁上歷史新高。

1996 年，中國大陸石油進口來源僅 19 個，石油進口貿易夥伴非常集中，東南亞的印尼是當時最大的石油進口來源國，,其次為阿曼、葉門、伊拉克，中國大陸進口比例高達八成。顯見，1990 年代中國大陸石油進口的來源地集中在東南亞和西亞等亞洲國家，當然也包括如非洲、北美的石油國家。2006 年起，中國大陸石油進口開始轉變，進口市場轉向多元化，中國大陸加強了與 OPEC 國家的石油合作。沙烏地阿拉伯成為中國大陸石油主要進口來源國，但中國大陸從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當時非 OPEC 國家的石油進口亦增多。2016 年，中國大陸石油進口的格局展現出新的方向，進口貿易夥伴除傳統的產油國外，也涵蓋新興的石油生產國。對石油進口多元化的戰略，有進一步深化的戰略方針，進口國數量也從 19 國提高為近 50 國。中國大陸調整了傳統單一 OPEC 的進口來源，加強與非 OPEC 的石油貿易交往。俄羅斯也成為中國大陸最大的石油來源國。其次，泛 OPEC 國家仍是中國大陸石油進口的主流，沙烏地阿拉伯特、安哥拉、阿曼、伊拉克、伊朗、委內瑞拉等六國的供給量，從占中國大陸石油總進口的八成降低為不到六成。同時，中國大陸石油進口的來源也擴展到了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地。中國大陸石油進口的格局不斷調整，進口範圍仍依然持續保持擴大趨勢。中國大陸近期與阿塞拜疆、柬埔寨、巴哈馬等部分新興產油國也展開了石油交易；非洲方面，中國大陸石油進口格局中的地位起輔助作用。[4]中國大陸從印尼、馬來西亞、哈薩克斯坦等中亞和東南亞國家的石油進口有升高的跡象。

第二節　中國大陸能源安全目標導向

一、中國大陸的石油供應狀況

[4] 郝麗莎，「非洲在世界石油供給格局的地位演變」，地理研究，2012 年 3 月，頁 507-520。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截至 2020 年中，中國大陸石油年消費量已超越美國，位居世界第一。而在中國大陸內部的供給能力方面，中國大陸石油的已知的探明量為 32.33 億噸，僅占世界儲量的 2.1%，年生產石油 1.69 億噸，占世界總生產量的 4.6% 。因而對外依存度高。如此大的石油進口量已經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關注，中國大陸石油供需形勢口趨嚴峻。國際經驗顯示，人均 GDP 達到 1,000 美元以後，人們的消費結構加速升級。隨之而來的，即是產業結構調整和工業化及城市化進程加快。因此，能源消費及供給的矛盾會更加突出。機械、汽車、鋼鐵等重工業快速發展、城市化水準提高和城市人口增長、世界製造業中心加速向中國大陸轉移，都將促使能源消耗大幅增加。隨著中國大陸向著消費型社會發展，伴隨而來的各種石油需求會不斷加強。另外，中國大陸面臨環境惡化的壓力增強，必然會減少煤炭的直接使用，這也會增加對石油的需求。可見，中國大陸石油消費已步入高消費軌道。

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程表明，國家經濟穩定、持續增長及居民生活水準不斷提高，總是與不斷增長的能源消費相適應。過去的 30 年，為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最快的 30 年，同時也是中國大陸能源消費最多和石油進口量攀升的 30 年。隨著中國大陸國內石油供應能力的不足，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長產生的矛盾將不斷加大，中國大陸進口石油的比重也會越來越大。1993 年，中國大陸成為石油的淨進口國，按照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目標，21 世紀中葉後，中國大陸經濟將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準，基本實現現代化。要達到這一目標，未來中國大陸的 GDP 增速必須保持在 7%或稍低程度的水準上。在未來的 20 年裡，隨著中國大陸工業化及城鎮化水準的提高，人民生活水準不斷改善，特別是小汽車大批量進入家庭以及交通運輸業發展，中國大陸石油需求將不斷增加。然而依現今中國大陸能源發展，未來 20 年內石油供應並不能滿足國內需求。依「世界能源統計評論」和「油氣雜誌」等對中國大陸石油探明儲量的估計，儲產比不到 15:10 這意味著，在沒有新增重大探明儲量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目前的石油探明儲量在 20 年內將開採耗盡。專家分析認為，在 21 世紀初的頭 10 年，中國大陸原油產量年增速僅有 0.5 %。中國大陸未來的石油需求缺口巨大，對外石油依賴程度將越來越高。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德國有關研究機構預測，到 2030 年中國大陸石油的對外依存度將達到 82%。[5]儘管國內外研究機構對中國大陸未來石油需求量估計不盡相同，但預測結果均表明未來中國大陸石油供應安全的嚴峻性。

二、石油需求提升下的獲得風險

隨著中國大陸對進口石油依賴程度不斷加深，中國大陸經濟面臨外部風險和政治壓力越來越大。目前，中國大陸仍缺乏應對國際石油市場變化應變能力及必要保障體系。如果國際石油市場再次發生前兩次的石油危機，出現供求緊張及油價暴漲現象，中國大陸經濟將無法受得了類似危機的衝擊。伴隨著需求提高，對進口石油依存度加深，使得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利益受到重大影響。石油是國民生計不可缺少的商品，同時也是重要戰略資源。依賴進口滿足國內需求時，也意味著中國大陸國家安全利益被束縛，最嚴重的情況，還會影響到國家整體外交戰略及國家的整體安全利益。

中國大陸石油安全的另一個難題，即是石油運輸的脆弱性，也就是所謂的「麻六甲困局」，[6]中國大陸石油進口的一半以上都來自中東、非洲、東南亞等地區，進口原油的五分之四左右是通過麻六甲海峽運輸，而歐美大國等一直控制著麻六甲海峽航運通道。基於「誰控制了麻六甲海峽，誰就扼制住了中國大陸的能源通道」，對於這條水道過度依賴，給了中國大陸能源安全帶來重大潛在威脅，中國大陸必須從新的戰略角度制定石油戰略，採取積極措施，確保國家能源安全。[7]另外，海上運輸還需承擔海盜風險，這種風險解除必須依靠國家的海軍力量，動用海軍為油輪護航，還涉及到與航線周邊國家要充分達成互信的共識，否則會引起不必要的外交糾紛，則得不償失。

中國大陸自 1993 年開始轉為石油淨進口國後，石油對外依存度逐年提高，石油需求來源安全就顯得亦為重要。依中國大陸家經濟發展的能源角度來看，石

---

[5] Frank Umbach, “Roundtable: Securing Energy-China's Policy and its Wider Strategic Implications", the Policy Planning Department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GAP), Berlin, 19-20 May,2003.

[6] 查道炯，「中國大陸石油安全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當代世界出版社，2005 年，頁 203。

[7] 石洪濤，「中國大陸的麻六甲困局」，中國大陸青年報，2004 年 6 月 15 日，第 1 版。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油將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物資，其面對的最大困難，也就是供應穩定性方面的問題，亦有關外部供應風險問題；再者，天然氣也中國大陸未來發展不可或缺的清潔化石能源，然天然氣與石油一樣，亦存在供應穩定性方面的問題；因此，評估中國大陸的能源安全策略，關鍵即是評估有關石油、天然氣氣的穩定性獲得和其他非化石能源的經濟性。

參照鄧富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大陸石油進口貿易效率及潛力研究」觀點提及，[8]中國大陸石油進口貿易存在一定的效率損失，研究結果提及，石油進口受海運距離因素的制約較小，受輸油管道等供給特徵的影響較大。中國大陸前期石油來源大多集中於印尼等國，在現今大規模進口的情勢下，多元化布局實為重要考量，也因此對石油進口的運輸通道和安全保障需要有更高的要求。綜觀國際石油運輸通道網路，均需滿足運輸量大、通道多元、風險可操控等條件。但是，現今中國大陸一半以上的石油運輸需經過由新加坡和美國控制的“麻六甲海峽”，加上近期南海局勢的緊張及越南的挑寡日益嚴重，加劇了中國大陸石油進口的運輸通道困境，已長期掣肘著中國大陸石油運送的安全的命脈。為突破所謂「麻六甲困局」，中國大陸近期一直努力通過拓展國際合作，以建設石油運輸通道等方式另闢石油運輸路線，然其中面臨著多國主權和政治軍事戰略布局問題，協調難度非短期可解決；另外，中國大陸石油運輸通道與管網建設所需的經費和技術，亦受國際大型石油公司制約，運輸通道建設時程冗長、耗費財力及承擔風險均面臨著巨大的壓力。

三、石油高度依賴下的油價波動困境

目前，石油期貨市場掌握在英美等國的手中，雖中國大陸的石油進口規模世界第一，但沒有相對應的國際石油定價權，儘管石油進口數量日益提高，但中國大陸無法控制國際油價的波動，但凡缺乏石油定價權，對石油獲得的安全亦是存在極大的風險。中國大陸石油進口價格的定價機制掌握在英美國家手上，英美二國常藉由些許理由聯合控制油價，中國大陸由於缺乏定價權受國際油價波動的衝

[8] 鄧富華，「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大陸石油進口貿易效率及潛力研究」，重慶人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第 5 期，2019 年 5 月，頁 27。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擊非常大，致使中國大陸進口石油代價沉重。[9]由此引起中國大陸每年多支出 75.8-1682.4 億美元之間，相當於中國大陸 GDP 的 0.57-3.93%。[10]

美國為避免對美元與黃金因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脫鉤後，美元霸權地位受到衝擊，為保證美國的財政安全，1974 年，美國政府與沙烏地阿拉伯達成協議，開始以國際石油貿易為突破口，沙烏地阿拉伯所有石油出口需以美元計價，同時將石油出口盈餘用於購買美國債券，到了 1975 年，所有 OPEC 國家皆以美元作為石油唯一計價貨幣，美元也因此重塑了信譽、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因此，國際石油貿易變採用“石油美元”結算，匯率波動直接影響石油價格變化，從而影響中國大陸的石油進口價格，美國亦長期借助期貨市場這金融武器，操縱國際石油價格。中國大陸雖於 2018 年創建以人民幣為主的石油期貨交易市場，然其原油期貨和人民幣國際化均處於草創階段，現今的交易量仍無法通過人民幣匯率脫離石油美元進口中的結算困境。中國大陸在石油市場缺乏主導權和話語權的情況下，中國大陸勢必變為國際油價的追隨者。

第三節　中亞地區的地緣安全

2013 年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選在中亞的第一大國哈薩克，提出所謂「絲綢之路經濟帶」，帶起了一帶一路倡議，可以顯見中亞對中國大陸未來發展的重要。近年來，中國大陸不僅在中亞地區扮演極其重要的合作角色，也透過若干機制與政策工具，藉由經濟與運輸計畫，處理這些前蘇聯中亞共和國當中的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和土庫曼之間的關係。儘管直到 2019 年為止，共同反對恐怖主義與極端主義，仍然是中國大陸對此地區主要克服的任務，但如何促進經濟合作以落實一帶一路布局，更已成為中亞五國與中國大陸的重心所在。對前述倡議而言，中亞的地緣位置無庸置疑處於關鍵，這也讓此區域對中

[9] 蔡玲，「發展石油期貨市場爭奪石油定價權」，中國大陸對外貿易，2008 年 7 月，頁 86-87。
[10] Hong L, Lin S X. “Do emerging markets matter in the world oil pricing system? Evidence of imported crude by China and India”, Energy Policy, August, 2011, PP. 624-630。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國大陸的重要性與日俱增。

近年來，由於民族主義的再次興起，新疆問題成為中國大陸在中亞發展所需關注的議題，而此地區人民又包括了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與吉爾吉斯人等，這也讓繼續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與分離主義等三大所謂「邪惡勢力」維持著重要的目標。儘管中國大陸政府強調針對少數分離主義的的穆斯林，但在習近平「中國大陸夢」的理想下，情況變得更加詭譎。中亞五國是中國大陸的鄰國，中亞地區的安全不僅對「一帶一路」建設有極大的影響，更可能對中國大陸西北地區的邊疆穩定產生重要作用。審視當前現況，中亞地區面臨的威脅主要有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民族衝突等，下文將對這些安全威脅做大致說明：

一、極端主義：

對中亞地區產生威脅，較為嚴重的主要是伊斯蘭極端主義。審視中亞國家紛紛於 1991 年蘇聯瓦解時獨立，前蘇聯時期政府，為避免伊斯蘭極端主義對中亞地區的操控，長期堅持無神主義和反宗教宣傳，對中亞地區各國人民的宗教信仰採嚴格限制措施，使該地區的宗教活動和熱情，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極大的壓制。惟中亞各國紛紛獨立後，受限制的宗教政策解除，各國均採取“伊斯蘭復興運動”，在穆斯林人數激增下，伊斯蘭教團體和清真寺數目也大幅增加，相關宗教活動及組織有了更大發展。伴隨著伊斯蘭復興運動，伊斯蘭教地位在中亞地區也大大提高，使得中亞國家的社會基礎產生了明顯變化。在這個變化的過程中，伊斯蘭教在中亞發展出現一股極端化的潮流，因伊斯蘭教義的催化，使伊斯蘭教在不同國家，發展成了不同程度的作用。

中亞地區傳統的伊斯蘭極端主義發展，自蘇聯解體的 20 世紀 90 年代初滋生。然而，受阿富汗以及中東局勢的影響，以 2010 年極端組織神學士政權所屬「哈裏發戰士」在哈薩克實施多起恐襲擊。自 2014 年因伊拉克政權解體及「伊斯蘭國」在中東興起之後，中亞地區的安全局勢也受到了影響。從這個局勢轉變來看，中亞地區受極端主義的影響，囿因地理環境條件及人口經濟因素，萌芽中的端思想在中亞地區傳播的一個新對象是婦女和青少年，更會對此地區未來構成巨大的安全威脅，總的來看，伊斯蘭極端主義在中亞地區並非現存的安全問題，

DOI:10.6814/NCCU202001412

但卻在不久的將來有成為重大威脅的條件。當前，中亞宗教極端勢力已呈現出國際化、年輕化、組織網路化等新特點，對中國大陸提倡的「一帶一路」建設及西部邊疆安全與穩定形成了重要威脅。另一方面，宗教極端主義也會破壞國內的政治穩定和周邊地區和平，不利於中國大陸的海外投資建設和區域經濟合作，且中亞激進的伊斯蘭主義，勢將激起新疆獨立運動的情緒，不利於中國大陸西部地區疆域的穩定。

二、恐怖主義

根據《2017 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報告》發佈的數據，[11]除阿富汗恐怖活動增加，中亞地區受恐怖主義影響已降低。另查「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全 162 國)」，[12]中亞五國中受恐怖主義最嚴重的國家是哈薩克(82 位)。另外，塔吉克和吉爾吉斯排名分別為 83 位和 85 位。而土庫曼和烏茲別克排名分別為 158 位和 160 位，說明了中亞地區受恐怖主義攻擊的影響很小。

當前，中亞地區的恐怖組織，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國際性組織，如基地組織、伊紮布特(又稱：穆斯林兄弟會)等；第二類是在中亞建立的，如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IMU，烏伊運)；第三類是在中亞的地區性組織，如庫爾德工人党、奧姆真理教(Japanese Aum Doomsday Cult, Aum Shinrikyo)。當前對中亞地區威脅、最大的恐怖組織主要有烏茲別克伊斯蘭運動、伊紮布特等。其活動範圍已經超出了一國疆域，對中亞國家乃至周邊地區的安全產生了嚴重威脅。

中亞地區因地域關係，穆斯林人口眾多，極易受到伊斯蘭極端思想的影響，儘管中亞地區近年來恐怖主義以大幅降低，但未來中亞地區反恐形勢不容小覷。因中亞地區臨近中東與阿富汗兩大恐怖主義溫床，容易受到恐怖主義外溢效果影響。另考量在國際反恐聯盟的打擊下，伊拉克北部的“伊斯蘭國”以近幾乎消滅，但“伊斯蘭國”在戰場的失利，極有可能它在世界範圍的報復及意識形態輸出。

---

11 「2019 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對外發布」，每日頭條，2019 年 11 月 20 日，https://kknews.cc/zh-。https://kknews.cc/zh-tw/world/mrjlxvp.html

12 「全球恐怖主義指數」，維基百科，2019 年 2 月 17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6%81%90%E6%80%96%E4%B8%BB%E7%BE%A9%E6%8C%87%E6%95%B8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總體而言，“伊斯蘭國”對中亞的安全威脅、主要體現在:通過阿富汗襲擾中亞國家邊界，增加中亞地區的有組織跨國犯罪與恐怖攻擊等。

三、民族衝突

歷史上，中亞五國數中國大陸北方民族所生存和占領的地域，發展到現在已屬於多民族國家。其中，哈薩克有 130 個民族，烏茲別克有 129 個民族，吉爾吉斯有 80 多個民族，塔吉克有 86 個民族，土庫曼也有約 100 個民族構成。[13]前蘇聯時期，中亞五國有俄羅斯人進住，因統治政權關係，他們在政經地位高於當地主要的民則，當然這也會引起當地民族的反抗。在蘇聯解體後的中亞各國紛紛獨立，因歷史情結，中亞五國憲法均規定，各國占多數的主體民族開始享有某些特權，這樣一來，原住在此地的俄羅斯人，在中亞的地位發生了變化，從而引起主體民族與俄羅斯族之間的矛盾。中亞各國的這類民族主義政策，損害了其他少數民族的利益和民族感情，使中亞主體民族與非主體民族之間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衝突。

第四節　小結

冷戰結束後，中亞石油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據能源專家估計，即使不把里海石油計算在內，中亞也是僅次於中東地區和西伯利亞的世界第三大石油儲存區，因此被稱為「21 世紀的中東」，更何況里海石油本身也是豐富的油氣資源儲存區域。里海沿岸含油氣區的面積多達 50 多萬平方公里，其與法國土地面積接近，在其西岸地區，里海沿岸含油氣區的亞塞拜然和俄羅斯達吉斯坦共和國部分地區，都含有豐富的油氣資源；在其東岸地區的哈薩克，有曼格什拉克和土庫曼油氣田。按其油氣儲量，里海地區處於像中東、西西伯利亞、伏爾加-烏拉爾等世界一級的油氣水準以上。[14]專業人士認為，里海含油氣地區儲量可以排在世界前第 5 位。「一帶一路」倡議所提供多方面建設與國際合作，為中國大陸短缺能源獲得管道

[13] 陳聯壁，「中亞五國的民族關係問題」，世界民族，2001 年 2 月，頁 31-32。
[14] 錢學文等，「中東、裡海油氣與中國大陸安全能源戰略」，時事出版社，2007 年，頁 316。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和相關衍生產業，提供前所未有機會。除確保中國大陸能源安全需求外，並可從二個方面來觀察中國大陸能源競爭力：第一：配合「一帶一路」的國際合作建設，參與國建設的資金運用，提高中國大陸能源產業建設投入能力；第二：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基礎建設合作，提升中國大陸能源產業的生產和供給能力。

1970 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機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DECD)國家在 1974 年成立了國際能源署(IEA)，明確了能源安全的定義為：可獲得、買得起、可持續性供應。主要說明瞭供應的穩定性和價格的經濟性。2014 年 6 月 13 日，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六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了「四個革命、一個合作」的能源戰略思想。[15]其中提出「推動能源供給革命，建立多元供應體系」，更為能源安全獲得指明了方向。考量中國大陸能源對外依存度將隨著國內經濟發展越來越高，這不僅是對能源供應順遂的挑戰，如果掌控不好，此亦將掣肘中國大陸經濟社會的發展。

中國大陸已是世界第一能源消費大國，中國大陸油氣耗用早從國內資源為主轉向以國外獲得。目前全球油氣資源雖豐富不致匱乏，但油氣也因分佈不均，成為少數國家或地區佔據壟斷。各國亦把油氣定為國家發展安全戰略的目標，因此全球油氣資源爭奪愈演愈烈。從科技面審視，能源領域所涉及的技術，更會影響中國大陸的能源安全獲得，科學技術的應用，不僅為技術本身的問題，它亦是控制它國能源獲得的主要方式(如原油探測、開採及運輸等)。現在的中國大陸科技，在這方面的技術水準與發達國家(如歐美等)還有極大的差距，更需要通過深度的國際交流合作，結合自主能力的發展取得能源技術和相關技術領域，為中國大陸能源供應安全提供技術保障。目前，中國大陸能源安全的目標，是通過儲備體系、進口通道等方面的建設，使中國大陸在遇到突發事件或極端情況時，能源供應可以滿足需求；另加強科學技術的研製與進步，同步調整產業能源結構，致力發展乾淨的能源如天然氣和非化石能源產業等，實現中國大陸對巴黎氣候大會上做出的環境承諾。

[15] 譚建生，「從能源資本認識“四個革命、一個合作”重大戰略思想」，人民網，2019 年 8 月 9 日，頁 1。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第四章 中國大陸與哈薩克的能源合作與安全戰略

能源戰略包括對內戰略和對外戰略兩部分，這兩部分各有不同的側重，同時又能相輔相成的聯繫在一起。對內能源戰略，主要關注的是一個國家國內能源的開發、管理和控制，國內經濟對能源需求、國內能源安全保障及能源結構調整使用率、能源節約與環保等問題。對外能源戰略，主要是確保能源安全進口，持久穩定的供應及合理的獲得價格，同時，以能源為基礎實現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安全。對外的戰略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為它與國家的經濟發展、軍事安全、政治穩定以及其它重大的戰略目標實現息息相關。一個國家如果缺少對外能源的戰略目標，僅靠些不系統的政策措施，是不能適應全球化背景下的國際角逐和大國博弈。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日益發展，中國大陸政府認識到能源問題勢將影響未來國家的成長腳步，因此在 1997 年「中國大陸的能源政策」中，重新訂定了中國大陸未來能源政策，同時高度強調了從傳統的煤炭能源政策體制，轉變成以天然氣、石油等多種能源綜合利用的產業。並同步在「中國大陸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了以勘探國內外資源、開發和生產的活動方針，中國大陸為海外石油天然氣資源開發，設定主要地點為中亞和俄羅斯、中東和北非、拉美等戰略區，[1]此後中國大陸的能源安全戰略，就從經濟層面提升到了國家安全層面。以下就中國大陸海外天然氣資源開發的政策，設定以哈薩克為主要的能源經濟發展模式，並探討中國大陸在美、英等國家威脅限制的情況下，與哈薩克能源合作模式與遭遇的危機，最後再依一帶一路倡議的規劃，研析相互合作的能源獲得安全戰略。

第一節、哈薩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外在威脅

[1] 倪健民，「國家能源安全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 7 月。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哈薩克位處中國大陸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西，並與俄羅斯等國及最大的內陸海洋裏海接壤，地理位置優越，自然資源豐富，具有較大的經濟發展潛力。但由於工業基礎落後，現在的經濟發展依賴天然資源出口發展模式，易受國際經濟情勢影響，缺少產業競爭力。近年來哈薩克配合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意圖振興國內製造業比率，然工業發展需配合國內整體製造環境及相關人才培育等，無法一蹴可幾。現哈薩克將配合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的背景條件，充分利用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發展貿易型服務業，打造成國際貿易中心和國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本篇將整理其地理位置的優勢後，續就哈薩克的經濟基礎及發展機遇等二個方面，對哈薩克經濟發展模式進行分析，並以絲綢之路經濟帶為基礎，就中國大陸能源安全戰略與哈薩克的合作方進行研討，以為中國大陸能源獲得開闢新路徑。

一、經濟發展模式

哈薩克在 1991 年蘇聯解體前(1991 年 12 月 25 日)的 1990 年 10 月 25 日發表主權宣言，並於 1991 年 12 月 10 日改稱為哈薩克共和國，同年 12 月 16 日宣布獨立，隨即於 12 月 21 日加入獨立國家國協(簡稱獨立國協，ＣＨＩ)，蘇聯解體後，哈薩克開始推動市場經濟和私有化，並積極參與國際性經濟合作組織。如上海合作組織(2001 年)、歐亞經濟聯盟(2014 年)及 WTO(2015 年)，2013 年中國大陸在哈薩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中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地主國哈薩克更因此熱烈響應。2013 年人均 GDP 已經成為獨聯體國家的第二大經濟體(俄羅斯第一)。

哈薩克位於歐亞大陸中心地帶，可東連東亞、西達歐洲，北接俄羅斯、南與中東南亞地區相連，其地理位置實為亞洲樞紐。且其自然資源種類齊全且儲量驚人，很多礦藏儲量占全球儲量的比例很高，這也包括了中國大陸短缺但需求量高的石油、天然氣儲量。因此，哈薩克經濟發展模式係以能源及礦業為主，依託豐富的石油及其它礦產資源，充分享受了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來的資源紅利，礦產資源開採成為哈薩克國經濟的主導產業。另有關影響國家發展的人口素質部分，囿因哈薩克屬蘇聯時期的重要管制地區，蘇聯時期的教育政策也造就哈薩克具有

DOI:10.6814/NCCU202001412

雄厚人力資源，保障經濟可持續穩定增長。

哈薩克憑藉著豐富的天然資源為經濟發展基礎，雖造就了豐足的資源紅利，但也因此衍生經濟結構單一。前蘇聯解體之前，哈薩克是其重工業發展地區，也因蘇聯國家政策的因素，導致輕工業基礎薄弱。立國之初，以資源開採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模式，導致以民生為主的各項輕工業產品，多數需要由外國進口，雖然在專業、科學及技術活動領域吸引了國外投資，但投資金額近乎全部被用在地質勘探等天然資源發展項目中，經濟發展嚴重不平衡。近期國際油價低迷拖累全國經濟發展。哈薩克雖油氣資源豐富，但由於煉油工業基礎薄弱，其所產石油大部分都以原油方式出口。另考量美國頁岩油開採成本不斷下降，國際油價在如以前般高價以不容易。同時，2019 年全球主要經濟體面臨如英國脫歐、歐洲黃背心運動及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等經濟不利因素，原油價格隨之下滑，哈薩克將無法再依原油出口，充實國家財政。

也因此，攸關民生發展的交通基礎設施落後，現今通過哈薩克的東西方向鐵路運輸主要依賴兩條鐵路，分別為 1904 年開通的「西伯利亞大陸橋(Siberian Land-bridge, SLB ）」和 1992 年開通運營的「新歐亞大陸橋」等兩條鐵路，均非哈薩克所建立，囿因途經國家眾多，與各個國家進行溝通協調困難，其中新亞歐大陸橋開通以來貨物運輸主要局限于中-哈兩國，鐵路運營無法有效運作，對運抵歐洲的國際貨物量較低。也因此降低了哈薩克作為歐亞大陸中心的地理優勢。然考量貨物運輸雖以海運節約的運輸成本較多，但綜合考量運輸成本和運輸時間後，陸路運輸仍具備相當明顯的優勢，伴隨著歐亞陸路貿易的崛起，位於歐亞大陸中心的哈薩克勢將迎來發展機遇。

2013 年中國大陸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中哈在「一帶一路」合作框架下，包括裏海的阿克套 (aktau) 港、2016 年開始營運的哈薩克一土庫曼斯坦一伊朗的鐵路、橫貫西歐一俄羅斯一哈薩克斯坦一中國大陸西部的「雙西公路」國際運輸走廊，亦於 2018 年啟用。2014 年 11 月哈薩克前總統納紮爾巴耶夫提出「光明大道」新經濟政策，[2]著重於交通物流、工業製造、礦產能源等領域的基礎建設，為

[2] 「哈薩克：光明大道計畫」，中亞科技服務中心，2019 年 3 月 21 日，

DOI:10.6814/NCCU202001412

了將哈薩克打造成全球交通走廊，用以連接中國大陸、中東和歐洲市場，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推動哈薩克交通基礎設施快速發展。

二、發展機遇與外在威脅

全球化的貿易進程中，中國大陸及其它發展中國大陸家，都是經濟全球化最大的獲益者，然面對英、美國發起的貿易保護主義，全世界各國都需積極探索新全球化發展模式。「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六年多來，哈薩克藉由和中國大陸的深度合作，現以和中國大陸成為主要交易夥伴，中國大陸更是哈薩克第二大商品進、出口國。哈薩克有著豐富的礦產資源，中國大陸有著廣大的消費市場和潛力，加上哈薩克近期碰上產業升級需要，更需龐大的資本和技術投入，而中國大陸自改革該放迄今，已累積有足夠充裕的資金和先進的技術儲備。因此，緊密的中-哈合作，是哈薩克構建新經濟發展模式必不可少的外部要素。

近年來，石油價格因受美操控，在價格一直處於低點，這迫使哈薩克的財政收入受到嚴重的影響。為了支援哈國制定的各項發展戰略，保障本國財政收入水準，哈薩克規劃以轉運貿易為軸點，大力發展服務型產業。哈薩克希望本國提高自主生產產品比重，降低國外進口比率，加強實現本土化經濟工業和經濟結構。伴隨著交通運輸能力不斷強化，該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規劃定位成歐亞大陸的中心樞紐市場，既可以是商品集散地，又將成為物流倉儲中心，在此基礎上發展金融、服務業，有效帶動其它行業發展，積極融入「一帶一路」發展倡議，實現中哈產業互補。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第二節　中國大陸與哈薩克的能源合作歷史進程

哈薩克地處中亞，擁有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是中亞地區油氣生產國之一，在世界油氣市場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3]加上哈薩克與中國大陸新疆地區相

http://zykjfwz.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849&id=454

[3] 朱雄關，「綢之路經濟帶戰略中的中俄能源合作新機遇」，思想戰線，2015 年，第 3 期，頁 120-122。

DOI:10.6814/NCCU202001412

鄰，既可以是中國大陸通往歐洲的陸路通道，又可以扮演中亞地區油氣輸往中國大陸的來源國。對於保障中國大陸能源獲得安全，具有十分關鍵的能源政治意義。近年來，在與中國大陸的合作下，哈薩克石油天然氣工業發展快速，中-哈兩國的油氣合作關係日益頻繁，合作前景持續向好。中國大陸和哈薩克自 1992 年 1 月建交後，兩國關係持續穩定發展，中哈石油、天然氣能源合作的進程大致經區分為四個階段：[4]

一、準備階段(1992 年 1 月一 1997 年 6 月)

中哈建交後，雙方建立了國家間合作的各項機制，這一階段兩國沒有實質性的能源合作，但兩國通過有關國防、邊界、交通、經貿、文化等方面的條約、公報和協定等，為兩國交往，進一步加強合作關係，尤其是在能源領域的合作奠定了強健的基礎。

1992 年 1 月 3 日，中國大陸由經貿部率團訪問哈薩克，並簽署了兩國建交公報；同年 2 月和 10 月，簽署了《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友好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1994 年 4 月，簽署了《中哈國界協定》、《關於中國大陸向哈薩克提供政府貸款的協定》及《兩國發展鐵路客貨運輸會談紀要》等；1995 年 9 月，簽署了《關於進一步發展和加深友好關係的聯合聲明》、《關於利用連雲港裝卸和運輸哈過境貨物的協定》，1996 年 7 月，時任中國大陸國家主席江澤民對哈進行了國事訪問，發表了題為“共創中國大陸和中亞友好合作的美好未來”的演講，雙方簽署了聯合聲明、引渡條約、中國大陸人民銀行和哈薩克國民銀行合作協定、保證進出口商品品質和相互認證的合作協定等。

二、初始階段(f 997 年 8 月-2003 年 3 月)

這一階段雙方展開油氣資源合作，但由於是剛剛起步，所以合作項目比較局限於油氣資源的開採，因哈薩克的基礎設施尚不完善，所以開採份額、能源貿易量比較小。1997 年 9 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訪問了哈薩克，並簽

[4] 朱雄關，「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大陸與沿線國家能源合作問題研究」，雲南大學博士論文，2016 年，頁 56-58。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署了《兩國政府關於在石油天然氣領域合作的協議》，提出建設哈薩克和中國大陸西部地區的輸油管道的構想，拉開了能源合作的序幕。中哈雙方續於1997-1999 年完成了管道建設可行性報告。2003 年 3 月 28 日，中哈原油管道的首期貫通後，即投入運營迄今，意味著中哈能源合作進入一個全新的階段。

三、發展階段((2003 年至 2010 年)

此階段中哈展開了大規模的能源領域合作，項目從傳統的石油開採、管道鋪設等，擴展到油氣勘探、開發和石油化學工業等多樣化產業，並執行雙方大規模產業並購項目。2003 年 3 月，中哈原油管道首期竣工並運營後，2004 年 5 月，哈薩克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與中國大陸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簽訂《關於哈薩克共和國阿塔蘇至中華人民共和國阿拉山口原油管道建設基本原則協議》，中哈石油第一條陸上跨國石油管道管道建設正式啟動，標誌著中國大陸改變了僅從海上進口和運輸石油的方式，增強了中國大陸石油進出口多元化的能力。2005 年 7 月，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共和國關於建立和發展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同年 10 月，中國大陸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收購哈薩克石油 PK 公司。2008 年 10 月，中石油與哈薩克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簽署《天然氣及天然氣管道領域擴大合作的框架協議》，共同推動開發”烏裡赫套”氣田，並實施中哈天然氣管道第二期專案。2009 年 4 月，中石油與哈薩克國家油氣股份公司簽署了《關於擴大石油天然氣領域合作及 50 億美元融資支援的框架協定》，雙方還與中亞石油有限公司簽署了《中國大陸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與哈薩克國家油氣股份公司聯合收購曼格什套油氣公司的協議》，合作範圍進一步加深。

四、深化階段(2011 年至今)

近年來，中哈兩國政治互信不斷提升，高層交往頻繁，2011 年 6 月，時任國家主席胡錦濤訪問哈薩克，與哈薩克簽署《中哈關於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5]，將兩國的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意味

[5] 「中哈關於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Wikisource，2011 年 6 月 13 日，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E4%B8%AD%E5%93%88%E5%85%B3%E4%BA%8E%E5%8F%91%E5%B1%95%E5%85%A8%E

DOI:10.6814/NCCU202001412

著中哈合作進入了一個新的戰略階段。2011 年 2 月，中石油與哈薩克國家油氣公司簽署《關於哈薩克烏裡赫套專案合作的原則協定》，律定雙方共同勘探烏裡赫套氣田。2014 年 12 月，中國大陸石油與哈薩克國家石油天然氣公司簽署了《擴大油氣領域科技合作協定》，深化中哈油氣在上下游領域一體化合作。2015 年 8 月，中哈雙方共同發表《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新階段的聯合宣言》，雙方表示將就「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和“光明之路”新經濟政策開展合作，將進一步深化中哈全面能源夥伴關係，除規劃開展油氣田勘探開發、原油加工等領域合作外，更擴大對中國大陸的石油、天然氣的能源出口。雙方並就中哈原油管道擴建、天然氣管道二期建設，奇姆肯特煉化廠現代化改造項目進行合作，願研究在中國大陸西部地區進行原料加工合作提出規劃方案[6]。

第三節　中國大陸與哈薩克的戰略合作

哈薩克是中國大陸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上最重要的能源獲得來源與合作夥伴。從地理位置上來看，哈薩克緊鄰中國大陸的新疆地區，在中國大陸與中亞各國及與歐洲國家進行能源合作和經貿往來，扮演著橋樑和紐帶作用，且哈薩克又是中國大陸的能源供給國和油氣管道過境國，在中國大陸能源獲得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意義。而對哈薩克而言，油氣工業是該國能源產業的的支柱，然因地處中亞，石油、天然氣出口市場的多元化勢必離不開中國大陸市場。以下將說明中國大陸的能源安全現狀，再說明哈薩克在中國大陸能源戰略安全扮演的角色，全方位審視中國大陸能源獲得問題。

一、中國大陸的能源安全現狀

國家安全係指國家基本的生存利益，所以國家安全在國家利益中居於核心主

9%9D%A2%E6%88%98%E7%95%A5%E4%BC%99%E4%BC%B4%E5%85%B3%E7%B3%BB%E7%9A%84%E8%81%94%E5%90%88%E5%A3%B0%E6%98%8E。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共和國聯合聲明」，中國大陸外交部，2019 年 9 月 12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697207.shtml。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導地位。國家安全伴隨著國際形勢的複雜化，不僅局限于傳統的主權、領土、政治、軍事領域，現進更發展到了經濟、資源、科技、資訊等非傳統領域。國家安全涉及的目標是由不同領域的安全目標共同構成。而其中能源作為國家戰略資源，不僅是國家安全的重要構成，同時也影響著其它領域安全目標的實現。

能源類型的需求，在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隨著時代的不同，有著不同的地位。19 世紀，煤炭是主導的燃料；到了 20 世紀，石油取代了煤炭成為主要形式。現在進入 21 世紀，對能源發展配合環境問題，有著多樣化需求，如天然氣、可再生能源以及核能源的應用等。國際能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預計，直到 2035 年，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等石化燃料在今後仍是世界能源組合中最重要的需求種類。但油氣資源分佈的不均衡性，也容易引發供需安全及運輸問題，影響著各國的能源獲得需求。故能源獲得安全是構成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也是研析國家戰略議題的重要的領域。

中國大陸目前煤炭資源佔能源資源總量比率較高，其主要儲藏在華北、西北等地，水力資源主要分佈在西南地區，石油、天然氣資源較為匱乏，主要係由他國進口後，存儲於東、中、西部地區。囿因中國大陸地理環境條件及城市發展，能源主要消費地區都集中在東南沿海，考量資源儲藏區與消費地區後發現，能源使用均需以大規模及長距離運送後，方可滿足使用者需求。而細查中國大陸煤炭資源開採條件較差，極少可採露天開採方式降低成本。石油天然氣資源更非中國大陸富藏，而水力資源多集中在西南部的高山深谷，開發難度和成本更大，需投入更多資源勘探，經濟性較差，缺乏競爭力。

在能源安全供應中，石油儲備佔舉足輕重的關鍵地位。現今中國大陸已成為一個能源消耗大國，在過去，石油來源單一且受制於英、美期貨市場及石油美元的操控，因此對其供求問題、價格變化、壟斷格局、運輸安全等，常受歐美各國複雜的國際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影響，一旦出現難以控制的變因，即會大大的危及國家安全(如北韓在 1970 年發生的石油危機衍生全國農業機械化遭受停擺)。目前，中國大陸石油生產中，原有的東部大慶油田已進入生產晚期，原油產量已下滑，另一方面，近期雖探勘出西部新疆地區有著豐富的石油資源，但地理環境及生活條件惡劣，如要達到量產規模，勢必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產量無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法立即供應日益成長的消費需求。此外，中國大陸能源探勘及開採技術雖取得很大進步，但與國際大型石油公司所擁有的技術還有很大差距，更別提開採後的運輸及存放技術，因此，若發生石油危機，則會出現難以應對的情況。

今天，國際能源供求秩序，無論是技術、資源、技術及運輸等均由美國掌控，中國大陸經濟發展自改革開放後，以無法擺脫對世界資源的依賴。在觀察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後的影響後及美國通過政治以及軍事手段掌控了大部分世界主要石油資源，中國大陸如果要能和平崛起，勢必要通建立自己的過能源外交管道，以擺脫美國政策的制約。因此，中國大陸不能完全信賴美國所主導的石油市場，而需積極參與建立自身的國際石油市場，以相互合作為基礎，與它國共同著力海外資源開發。

二、哈薩克與中國大陸的能源戰略安全合作

哈薩克的石油探明儲量一直保持著增長勢頭，隨著裡海沿岸卡沙甘油田等大型油田的相繼發現與開發，哈薩克石油探明儲量居世界第 12 位(獨聯體國家第 2 位)，僅次於俄羅斯。另哈薩克不僅是一個石油資源富足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天然氣探明可采儲量比較可觀的國家，其天然氣占世界天然氣探明總儲量第 18 位(獨聯體國家第 3 位)，僅次於俄羅斯和土庫曼。[7]

Richard 在《哈中夥伴關係》中，對哈薩克與中國大陸的夥伴關係進行了描述，哈薩克在中國大陸的目標，包括通過獲得援助以促進國家獨立、領土完整和經濟發展。由於這些目標與中國大陸的戰略目標符合，中、哈關係總體良好。中國大陸在中亞不斷增長的經濟與安全，可在未來幾年將雙方合作關係提升到更高的水準。哈薩克一直致力於實施一項「多元化」外交政策，力求與在歐、亞大陸佔有重要經濟，政治或其它角色，並與相關國家保持良好關係。中國大陸在這一框架中可發揮重要作用，中國大陸作為俄羅斯和西方的平衡者，並可成為哈薩克的經濟發展夥伴，使得雙方在經濟關係進一步增長。中國大陸在哈薩克的目標包括，打擊對中國大陸的恐怖主義威脅，使中國大陸企業獲得哈薩克的能源資源及

[7] 黃偉，「哈薩克石油天然氣工業發展現狀及展望」，天然氣與石油，2015 年 3 月，第 2 期，頁 1-8。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參與哈薩克貿易和投資的機會。中國大陸希望幫助哈薩克發展交通運輸與其它經濟基礎設施，用以增強中國大陸在其它中亞國家和地區的經濟活動。此外，中國大陸的戰略家，亦希望哈薩克能幫助北京平衡其它參與中亞地區大國的存在，包括印度和美國。

將中國大陸與哈薩克的關係區別於其它中亞國家的關係，其中一個獨特因素是民族重疊。現今約有 18 萬維吾爾族人居住在哈薩克東部。然而卻有多達 100 萬的哈薩克族人生活在中國大陸，特別是在新疆。哈薩克雖然允許維吾爾族從事有限度的政治活動，但不允許維吾爾族人在哈薩可以外的地區如中國大陸，從事未經授權的活動，並驅趕被中國大陸人指控為恐怖主義的維吾爾族人。同時，中國大陸向哈薩克提供了關於恐怖主義威脅、國防設備及軍事訓練和情報。哈薩克國家安全委員會與中國大陸公安部，亦定期在邊境地區執行聯合反恐演習。哈薩克和中國大陸執法機構合作打擊販運毒品和武器。許多中國大陸－哈薩克安全合作，都是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進行的。2010 年 9 月，在哈薩克南部舉行重大軍事演習「和平使命 2010」，雙方均利用此機會發展雙方的防務關係。中國大陸表示，哈薩克允許中國大陸的軍機對其領土進行模擬轟炸，其表現出了對中國大陸的「極大信任」。雖然安全考慮是主導中國大陸對哈薩克和其它中亞鄰國的政策，但經濟，尤其是能源策略已變得越來越重要的問題。由於其豐富的能源，哈薩克已成為中國大陸在中亞最重要的經濟夥伴。[8]

近期，世界石油價下跌，導致以石油為出口依賴的俄羅斯經濟處於低迷狀態，加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亦同步影響哈薩克的國民經濟。2014 年 11 月，為了促進經濟復蘇，哈薩克前總統納紮爾巴耶夫在國情咨文中宣佈，規劃實施大規模投資計畫，這一計畫被稱為「光明之路」。「光明之路」計畫在 3 年內投入 90 億美元到工業和能源基礎設施、運輸物流、公共設施、住房和社會基礎設施以及中小型企業扶持等方面。「光明之路」經濟政策與中國大陸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互補性非常強。「光明之路」的核心，是通過改善哈薩克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打造亞、歐大陸交通樞紐，帶動哈薩克國內的能源、工

[8] Richard W. “The underappreciated China-Kazakhstan partnership”, May 5 2017,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the-underappreciated-china-kazakhstan-partnership/.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業生產，並同步發展交通物流等行業，始其成為促進哈薩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而「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核心，規劃在沿線周邊各國政府機制的協助下，聯通亞、歐大陸，從而促進經濟流動、資源高效地分配以及市場深度融合，深化區域內國家的合作，共同建造區域內經濟合作架構。

「光明之路」與「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在戰略目標上具有許多共同點。「光明之路」可通過哈薩克的的地理位置，成為亞歐貿易的交通樞紐、並利用其自然資源豐富、投資環境良好等優勢，促進哈薩克與中國大陸及其他中亞地區國家的互聯互通，推動能源、經貿合作的發展，深化「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實現廣範圍、高水準及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而「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一方面可為哈薩克「光明之路」政策實施提供資金、技術、設備支援，通過中-哈合作促進哈薩克調整經濟結構與產業發展，增進消費，創造投資與就業，為哈薩克的經濟發展助一臂之力；另一方面可促進中哈及沿線其他中亞國家深入合作，建立起良好的互聯互通夥伴關係，進而推進區域經濟的一體化進程。[9]

從對哈薩克油氣資源儲存的狀況分析，哈薩克是一個油氣資源豐富的國家，但中國大陸受哈薩克天然氣供需平衡的影響，與哈薩克的能源合作主要在石油領域，自一帶一路倡議以來，伴隨著哈薩克天然氣產量的增長，中國大陸在天然氣領域的合作持續擴大。2006 年，哈薩克的原油通過管道到進入中國大陸，除了促進了哈薩克石油出口多元化，更提高了中國大陸石油獲得的安全係數和經濟效益，進而開闢了中國大陸進口石油的新時代。當前，隨著中國大陸「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與實施，中哈油氣合作將進一步深化拓展。

四節　小結

中國大陸新安全觀，是中國大陸共產黨的領導集體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依據當前的國際形勢與中國大陸的實際情況，創造性地提出並不斷發展修訂。自提

[9] 宋利芳，「哈中絲路經濟帶戰略與光明之路新經濟政策的對接」，中國大陸流通經濟，2016，頁 70~75。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出以來，中國大陸新安全觀歷經三個時期的不斷發展，逐漸成為維護中國大陸國家安全總體指導原則。當前，在新的世界局勢條件下，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審時度勢後逐漸形成了以「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為核心的新國家安全觀，實現了中國大陸新安全觀豐富和完善。面對「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複雜形勢，堅持中國大陸新安全觀的指導地位，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

中亞石油開發帶有濃厚政治色彩。冷戰結束後，隨著中亞各國在一夜之間由前蘇聯的勢力範圍，變成了一塊國際政治的權力真空地帶，其地緣政治地位因能源問題日益突顯。世界各國尤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爭先恐後的搶佔這塊地緣「心臟」，至今未落下帷幕。特別是在「9"11 恐怖攻擊」之後，美國惟恐中亞地區成為新的恐怖主義滋生溫床，更是借反恐名義進入中亞。因此，隨著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看重其戰略價值，在開發中亞地區石油時，也不可避免地帶有地緣政治考慮。例如在確定油氣管道走向上，主要作用不是管道經濟性，而是地緣政治因素，因為幾乎所有研究報告都認為，最短和最經濟的管道線路是伊朗線路，但因為美國等國的積極反對下而擱淺。如果修建油氣管道的問題不能儘速找到解決方案，就不可能真正使用中亞石油，因它從開採到運輸尚需很長時間。

在全球化的經濟發展的前提下，各國間的能源合作，也攸關解決能源安全問題的重要方法，對於某些能源資源缺乏且高度依賴能源進口的國家而言，能源合作可成為解決能源獲得安全的方式。但國家與國家間的能源合作，容易受到經濟、政治、文化、國際關係等因素的影響。各種國際因素交互影響下，使能源合作出現複雜化。因此，各國在確保國家經濟成長的條件下，如何有效獲得能源安全即是確保國家發展的基石，故能源合作已提升為國家戰略，成為攸關國家發展的重要因素。

「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是中國大陸主動應對全球形勢變化、統整國內成長和國際合作兩大面相所作出的戰略決策，是因應中國大陸發展新時期周邊外交的重要戰略佈局，推進中國大陸與周邊沿線國家全方位合作的共同發展事業。這其中扮演關鍵角色的，就是推進中國大陸與周邊沿線國家的能源合作，是「一帶一路」戰略推進最為重要的一個面向。鑑此，在深入了解分析「一帶一路」沿線地區能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源形勢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現狀基礎上，構建能源合作的大通道和能源合作機制，對於中國大陸增加與「一帶一路」周邊沿線國家的能源合作強度，以保障中國大陸未來的能源安全，是具有一定的決策的輔助價值。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第五章 結論

第一節、研究發現

審視中國大陸歷史的發展與演進，中亞各國與中國大陸的發展，無論是經濟、文化、軍事及政治等都是息息相關且互相合作，一直到近百年來中國大陸政權的施政方針及軍事力量的衰弱，對中亞各國的經略方才放緩或消逝。然伴隨著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國力的逐漸強大，經略中亞的方案在「一帶一路」提出後，再度獲得重視。囿因中國大陸與中亞沿線多數國家有著友好的國家間關係與傳統的合作基礎。同時，由於「一帶一路」沿線的中亞、中東、非洲，甚至於俄羅斯等地區和國家地緣區位特殊，油氣資源富足，二戰以來即是歐美各國能源爭奪和政治博弈最為激烈的地區。因此，中國大陸在推動「一帶一路」能源合作進程中，將面臨來自沿線國家內部和域內外大國能源地緣政治的挑戰。鑑此，本篇在參考現今國際局勢的條件背景下，提出以下研究發現：

一、中亞國家政治經濟的不確定

中亞五國中，哈薩克、土庫曼、烏茲別克等油氣國家，其政治特徵屬權力高度集中的國家，這些國家在脫離蘇聯獨立後，採用了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體制，但國家權力卻集中在以總統為核心的元首身上，國家體制缺乏制衡機制，故政治穩定性相對薄弱。哈薩克前總統納紮爾巴耶夫(1991-2019)，烏茲別克前總統卡里莫夫(1990-2016)，都是自上紀 90 年代兩國獨立後就一直擔任國家元首；而土庫曼前總統如尼亞佐夫(1991-2006)及現任的別迪穆罕默多夫(2007-迄今)，擔任國家元首都超過十年之久。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在中亞國家獨立初期，可促進國內經濟發展和社會的穩定，但伴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風氣的改變，國家治理上免不了會遇到組織腐敗的行為(如印尼的蘇式政權)。如碰到如當前國際油價起伏不定，這些國家的油氣開發和能源對外貿易極易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進而造成國家經濟發展的遲滯。其國家政策走向也易伴隨大國影響而變動(如哈薩克)，這些問題都將對中亞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某些程度的影響，

DOI:10.6814/NCCU202001412

也直接的影響中國大陸對其能源合作的穩定性和長期性。

二、「一帶一路」戰略面臨的戰略競爭

(一)美國推行“新絲綢之路(The New Silk Road)”計畫

1997 年美國提出“新絲綢之路”計畫，主要是推動以阿富汗為中心，向東包括巴基斯坦、印度等南亞國家，向北包括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等中亞國家，由美國主導促成中亞、南亞在政治、經濟、能源和交通等領域的合作，並將中國大陸和俄羅斯排除在外，從而實現美國在中亞和南亞地區的戰略利益[1]。通過建設貫穿阿富汗，連接南亞和中亞的交通和能源管線，實現“能源南下”和“商品北上”的策略目標，目前雖因川普政權的影響“新絲綢之路”計畫已遭擱置，但其當時推動的土庫曼一阿富汗一巴基斯坦一印度(TAPI)跨國天然氣管道，現在正如火如荼地執行，對中國大陸推動的能源安全戰略，亦造成相當的影響。

(二)歐盟推動的中亞戰略

傳統歐洲大國一直對中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價值有著強烈的使命感，在歐盟成立後，深化經略中亞的方向也未曾改變。上紀九十年代初，中亞各國因蘇聯解體紛紛獨立後，歐盟主要成員國迅速與中亞國家建立關係，開始實施對中亞國家的外交接觸政策，如 2020 年 3 月歐盟理事會批准與哈薩克簽訂“擴大夥伴關係與合作協定”。因定地緣政治格局與油氣資源的掌握，歐盟提高了對中亞地區在國際事務上的關注程度，在德國的推動下，2006 年歐盟醞釀出完整的中亞戰略、2019 年 5 月，歐洲委員會同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共同發佈題為“歐盟與中亞：更堅實夥伴關係的新機遇”的聯合聲明，闡述與中亞五國加強夥伴關係的願景。從戰略意義看，歐盟與中亞國家的建立戰略性夥伴關係，將使歐盟與中亞各國的關係提高到戰略性高度，中亞已然成為歐盟新的外交重點。從戰略目標看，歐盟的中亞戰略主要是為了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歐盟不僅可通過雙邊或多邊的方式與中亞國家合作，更全方位的和中亞國家在能源、交通、環境、教育等領域合作，從實施內容看，歐盟的中亞戰略主要是建立歐盟各成員國與中亞各國

[1] 楊雷，「美國“新絲綢之路”計畫的實施目標及其國際影響」，新疆社會科學，2012 年第 5 期，頁 70-75.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的政治接觸與對話機制，加大對中亞油氣資源的開發和石油、天然氣運輸管道建設和投資力度，通過建設“歐亞通道”和“跨歐通道”，把中亞打造成連接歐亞交通運輸的通道和樞紐[2]。

(三) 俄羅斯構建歐亞經濟聯盟

“歐亞經濟聯盟”是由哈薩克前總統納扎爾巴耶夫於 1994 年在莫斯科大學演講時提出[3]，並於 2014 年由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三國總統在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簽約正式成立“歐亞經濟聯盟”， 2015 年 1 月 1 日歐亞經濟聯盟正式啟動。這是一個由俄羅斯主導所構建的歐亞經濟聯盟，其目的是為了推動俄羅斯經濟增長，並可藉由經濟合作，實現周邊國家的安全和政治穩定，並進一步的緩解來自歐盟以及中國大陸的地緣政治壓力。從“歐亞經濟聯盟”組成的規模看，這是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合作共同體，從聯盟組建的機制看，在莫斯科(俄羅斯)設立歐亞經濟聯盟委員會，在明斯克(白俄羅斯)設立歐亞法院，在阿拉木圖(哈薩克)設立金融監管機構，其管理層面及範圍擴及各成員國，後續可進一步實俄羅斯現對中亞國家尤其獨聯體國家為主的擴員。“歐亞經濟聯盟”規劃在 2025 年前，實現歐亞經濟聯盟內部商品、服務、資金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及建立統一的石油、天然氣市場，綜觀由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將是對中國大陸構建「一帶一路」戰略推進有一定的影響，當然也影響了中國大陸獲取穩定的能源安全戰略。

(四) 日本開展絲綢之路外交戰略

日本早期因地緣因素及蘇聯的存在，對中亞各國的外交關係著墨不深，直到 1997 年時任內閣首相橋本龍太郎首次提出“絲綢之路外交”，方才開始與中亞的交往，然日本提出“絲綢之路外交”的本意，是為了保障日本能從多元管道來獲取能源。從動機看，日本的“絲綢之路外交”戰略主要是針對中亞地區豐富的油氣資源，同時，通過與中亞國家建立緊密關係，加強對中亞地區的政治影響力和經貿合作，達到牽制中國大陸和俄羅斯的目的。雖然到目前為止，日本的“絲

[2] 張迎紅，「歐盟對中亞戰略淺析」，東南亞縱橫，2010 年 12 月，第 12 期，頁 90-94。
[3] 李建民，「歐亞經濟聯盟:理想與現實」，「歐亞經濟」，2015 年 3 月，第 03 期，頁 1-64。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綢之路外交”戰略並沒有取得的實質性進展和合作成果，但日本通過這一模式所建立起來的會晤機制，在推進日本與中亞各國更為緊密的合作關係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亦增加中國大陸獲得能源安全的變因。

第二節、研究展望與建議

隨著國際安全形勢變化，冷戰時期所強調國家和集團之間的對抗性及零和博弈的思維，已經不能適應當今時代的要求。中國大陸是「一帶一路」的宣導者和推動者，但建設「一帶一路」已不是中國大陸一家的事情。面對「一帶一路」的複雜形勢，單憑中國大陸一己之力難有作為，需要各國間的團結合作、共同應對。合作安全觀要求在安全合作過程中，通過各方的對話合作促進安全，並堅持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爭端，反對通過武力或武力脅迫相威脅。合作的基礎應該是國家間信任和利益的互補性。在具體的合作中，通過以對話的方式解決爭端，並以協商的方式化解分歧，在平等參與、協調一致、求同存異、循序漸進基礎上開展多形式、多層次、多管道安全對話與合作，通過加強各領域合作，擴大共同利益，最終實現安全的目的。

「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提出的應對全球形勢變化的戰略構想，亦為中國大陸和平崛起所對應的重要外交戰略佈局，對於強化中國大陸與沿線國家全方位合作和共同發展意義重大。長期以來，中國大陸的發展受限於歐美等海權國家對全球各大洋的控制，更遑論所謂第一、二島鏈的箝制，為了突破封鎖，中國大陸提出與沿線國家藉由「一帶一路」執行能源合作，即是「一帶一路」戰略合作推進最為重要的一個戰略要點。因此，在分析研究「一帶一路」沿線地區能源地緣政治形勢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發展現狀前景的基礎上，並以鄰近能源大國哈薩克為合作參考重點，提出構建能源合作機制等建議，對於中國大陸與周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合作力度，期有一定的參考作用和決策的輔助價值。

一、提升雙方基礎建設合作力度

自 1991 年獨立以來，哈薩克等中亞五國均為經濟轉型國家，初始時因建國

DOI:10.6814/NCCU202001412

不久，導致經濟衰退，但在 2000 年後因油價高漲，經濟逐漸復蘇，近年來經濟配合全球發展而增長快速，與世界貿易總額也同步增加。中國大陸的疆域中，西陲的新疆是中國大陸傳統向西開放的主要窗口，其自然資源、氣候類型和文化環境均與中亞五國有諸多相同之處，現今是中國大陸向西接觸的媒介，有著傳送帶的作用。中國大陸因藉此因素，藉由新疆的媒介與中亞五國的經濟、文化等方面強化合作與交流，藉以對新疆基礎設施、產業升級等方面的投資，發揮區域經濟整合的增加效應。

中國大陸經濟與發展自改革開放後，有著跳躍式的成長，參照美國在二戰後也有相同的經驗，但美國較專注於對歐洲的經略，因此周邊國家的經濟發展無法與美國發展同步。因此，中國大陸可以藉由自身的發展，整合如哈薩克等中亞五國區域經濟，以經貿一體化的經略方案，攜手與中亞五國家的經濟發展併同成長，從理論和實際層面支持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區域經濟合作戰略。這種以邊際效益的促進作用，其效果取決於夥伴間的經濟發展程度，對中國大陸和中亞五國來說都有著顯著的效果。在保障中國大陸能源安全戰略的前提下，可充分考慮中國大陸與中亞五國區域經濟的深度合作，降低或消除內部貿易壁壘，使得人才、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流動更加自由，在哈薩克等中亞五國建立更多相互合作的企業，培養並提升當地勞動力，促進當地製造業產業升級，達到共贏的局面。

二、嚴防中美競合及世界政治經濟變化

在國際競合的領域中，國與國競爭的是影響力，這其中又以文化的影響力最為有效。中國大陸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開創了國際合作的另一模式，自實行以來，「一帶一路」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就。統計自 2019 年 4 月止，共有 126 個國家、29 個國際組織同中方完成簽署合作文件，有關「一帶一路」合作主張寫入了聯合國、20 國集團、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合作組織等國際機制。對此，傳統強權如美國等勢將無法坐視，因此不斷以增加債務、破壞環境、經濟搶奪張等理由，進行抹黑攻擊，更提出“印太戰略”框架予以應對，藉此拉攏印度對抗中國大陸。2019 年 11 月，美國啟動“藍點網路”計畫，通過確立新的基礎設施標準來阻擋

DOI:10.6814/NCCU202001412

中國大陸「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競爭優勢。

美國川普政府近期不斷加強對中國大陸的制裁，原因係中美間戰略分歧的擴大。中國大陸是由共產黨組成的政權，在民主深化的美國內部，其政治制度、經濟模式等發展均存在顯著差異，使得中美兩國在戰略層面存在不同的發展模式，對國際戰略布局亦有不同的方向，因此在國際秩序的主張和戰略方面存在分歧。自中美建交到 2010 年，中國大陸從傳統工業落後的國家，躍升式地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相對美國的綜合國力卻相對下降。因此，美國對中國大陸的崛起充滿焦慮，認為中國大陸與美國勢必爭奪世界霸權地位。川普政府所採取的一系列對中國大陸的制裁措施，已把中國大陸定位為“戰略競爭對手”，2019 年更以大國競爭取代反恐戰略，更以邊緣戰略挑起的貿易戰、科技戰乃至金融戰，消蝕了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中美關係穩定的基礎，使中美關係再度面臨選擇方向。

2020 年初的新冠疫情打亂了中國大陸的經濟布署，後續的演變更對世界經濟造成巨大衝擊，現美國作為新冠疫情的重災區，其經濟遭受的衝擊更是史無前例，雖後續在美國聯準會和財政部的努力下，美國暫時挺住了因疫情演變的經濟蕭條，但其他地方卻沒有美國的財政優勢，恐將導致全球經濟衰退，進一步削弱依靠能源出口的國家。新冠疫情伴隨著美國大選臨近，川普政府為獲取選票，必然將主要精力放在經濟上。鑒於美國當前失業率已逼近 1930 年代大蕭條的形勢，川普政府的促進美國“再工業化”的目標更加明顯，因此打壓中國大陸經濟發展，擾亂中國大陸的發展環境(如迫使日、韓爭鬥)，逼迫美國企業撤離，增加國族仇恨等，這都將進一步加大中、美經濟競爭的風險，當前以小規模的發生如美、日、澳、加、印等國抱團抗中的現象，後續如此情事勢將更加嚴重，當世界其他經濟體被迫在兩大經濟體之間作出選擇時，中國大陸所推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所帶來的發展優勢及所需要的能源安全目標勢必會受阻擾而降低執行效率。鑑此，觀察中國大陸的因應機制和應對準備，是值得我們觀察。

三、深化中國大陸對中亞國家軟實力外交關係

中國大陸對中亞國家的軟實力外交，包括建立孔子學院、宣傳中國大陸發展

DOI:10.6814/NCCU202001412

道路、建立文化代表處、發展中國大陸旅遊業、促進中國大陸經典作品翻譯和促進中國大陸與中亞的文化交流、介紹中國大陸發展模式為主要形式，是中國大陸對中亞整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服務於中國大陸和中亞各國人民之間的「民心相通」。目前，在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框架下，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不僅在區域經濟合作的深度和廣度上，取得了巨大進步，而且在雙方合組織框架下，政治、人文交流、軍事等領域的成績，也頗有令人矚目的成績。中國大陸的中亞外交，無論在雙邊領域還是多邊領域上，都是成功的典範，這對於推動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上，發揮了重要的示範效應，是新時代中國大陸周邊外交和中亞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在取得巨大成就的當下，更不能忽視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進程中，所客觀存在的各種制約因素。因此，需要根據實際情況和需求，進一步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在中亞地區紮根、落地及合作共贏的成果，使其能被各方實在地享受，從而使得「中國大陸倡議」在中亞地區深入人心，增強中國大陸國家軟實力。

中國大陸在中亞的軟實力外交，是具有中國大陸特色的外交，它在實踐過程中，不斷摸索和創新，是實力與影響力、政府與企業、中央與地方、內部宣傳與外部宣傳相互統籌的結果，也是中國大陸外交部、文化部、宣傳部與商務部等各部相互分工又彼此配合的實踐。為確保中國大陸與中亞外交的順利開展，中國大陸政府建議從以下幾方面著手:

第一，建立中國大陸和俄羅斯在中亞的戰略互信。俄羅斯在中亞地區的安全領域擁有傳統影響力，中國大陸與中亞外交，應認同俄羅斯對中亞地區安全領域的主導。中、俄攜手合作，共同維護中亞國家地區安全和穩定。近年來，特別是美國自 2014 年從阿富汗逐漸撤軍以後，阿富汗戰爭後果已向臨近的中亞地區蔓延，中亞地區安全形勢面臨挑戰，安全問題複雜，地區安全風險加劇。中亞地區恐怖主義威脅的增加，將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帶來嚴重安全風險，對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貿易投資、人員往來等，也有安全挑戰。俄羅斯在中亞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安全等領域，具有深厚的影響力，以俄羅斯為主導的集體安全性群組織，現仍是中亞地區重要的安全合作機制。中國大陸與俄羅斯在維護中亞地區安全方面，應具有共同的戰略利益，中國大陸應支持俄羅斯在中亞地區安全領域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持續發揮主導作用，不去挑戰俄方的現有地位。並強加雙邊的安全合作，可採強化中俄與中亞國家資訊交流等相關合作。作為上海合作組織的成員國，雙邊、多邊合作基礎牢固。成員國間共同應對以恐怖主義、宗教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為代表的勢力，對地區安全挑戰應符合各方核心利益。另因美國不僅從阿富汗撤軍，同時也逐漸從中亞地區的軍事基地撤離，把阿富汗戰爭的爛攤子丟給周邊國家。在阿富汗問題長期複雜化的背景下，中國大陸需在中亞安全領域採取切實有效的措施，特別是以實際行動來支援集體安全條約組織在中亞地區的安全合作，從既有的機制中發揮主導作用，防止阿富汗問題外溢，直接影響到中亞地區和中國大陸邊境的和平穩定。

第二，尊重中亞國家自主選擇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中國大陸應重視中亞五國國內政治環境的變化，在制定中亞地區外交政策時，從中亞國家實際需求出發，尋找適合中亞國家國情的合作模式，發揮政策吸引力。中亞地區獨立三十多年來，隨著中亞領導人的逐漸老去，中亞各國正進入「權力更迭期」，中亞國家的政治發展前景，現為國際社會所矚目。「絲綢之路經濟帶」作為一項長期建設的區域經濟合作倡議，相關建設勢必受中亞國家權力更迭的影響。因此，應重視中亞國家政治環境變化，從中亞國家實際需求出發，相關政策措施需能推動中國大陸和中亞國家的區域經濟合作，並針對中亞地區不同國家的現實需求，探索具體的合作形式。從安全需求看，中亞國家的安全形勢複雜，非傳統安全威胁依然存在，在地區局勢不明、國際金融動盪、貿易保護主義、民生問題等的情況下，不確定性加劇中亞國家安全風險，中亞國家安全需求在未來時間仍然處於上升階段。另外，從經濟發展角度來看，哈薩克提出了「2030-2050 戰略」、烏茲別克通過以漸進式的改革，尋找適合本國國情的「烏茲別克模式」；吉爾吉斯正在進行「2013-2017 年國家發展穩定戰略」；塔吉克致力於降低貧困的戰略計畫正在實施；土庫曼則採取了對外能源出口多元化戰略，以解決能源出口線路短板。可見中亞地區各國的發展需求與戰略選擇均不盡相同。「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如何對接中亞國家的發展方式和定位，這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是否成功，絕對是一個非常關鍵的考驗。再從社會和諧角度來看。經過近三十年的發展，中亞國家在社會各領域取得了成就，但也存在一些社會和諧的問題。主要包括民族問題、領土

DOI:10.6814/NCCU202001412

問題、宗教問題、民生問題、自然資源以及社會動亂等，在此情況下，中亞國家出臺的社會發展戰略，均以維護社會穩定與和諧為主。

總之，中亞國家在經歷了蘇聯解體、獨立建國、社會重構、政治轉型等過程，並經過自身努力和它國的支持，逐漸走上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及民生改善等作為，成為一個新生國家，中亞五國對國家建設發展的方向、道路諸多嘗試，制定了自身的發展戰略規劃。「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與中亞國家的發展戰略可有許多切入點，做好國家層面的政策交流，對接中亞國家發展戰略，滿足中亞國家戰略發展現實需求，是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經濟合作的重要助力，也是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前提。如何尋求一個適應中亞國家國情發展的共建模式，才能妥適度過中亞國家的「權力更迭期」，以利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快速發展，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成功打下堅定基石。也唯如此，中國大陸中亞外交方能取得成功。

第三，實現中國大陸與中亞國家發展戰略對接。中國大陸應謹慎評估其它國際間的大國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方案，以推動「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競合關係，做好頂層外交設計，探索「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其它中亞區域合作方案，讓其可共存、共生、共榮。中亞地區是具重要地緣戰略影響的區域，現存區域經濟合作方案，如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土耳其主導的「突厥語國家元首會議」、歐盟與中亞國家的「夥伴合作計畫」、美國的「大中亞計畫」和「新絲路戰略」，伊朗的「國際南北交通走廊」計畫等、此外，印度、日本、韓國也相繼加強了與中亞國家的合作。中國大陸作為合作型的地緣經濟戰略，「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在進行頂層設計時，應充分考慮中亞地區現有的制度與合作方案，強化與現有制度的互補性，探索「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其它中亞區域合作方案的共存共生。

習近平總書記在 2015 年「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上演講的主旨中，明確指出：「一帶一路」建設不是要替代現有地區合作機制，而是要在既有的基礎上，推動沿線各國經濟戰略的相互對接，擴大優勢互補。中國大陸政府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開發銀行」，成立「絲路基金」以及擴大「上合組織」框架下的「中國一歐亞經濟合作基金」規模，即是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提供的重要區域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產品，對於推動中國大陸與中亞區域經濟合作具有重要意義。從功能來看，這些公共產品主要目的在於為發展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為資源開發、產業合作提供融資支援，與中亞地區現有的制度安排能夠形成良性互補，提高了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其他中亞區域合作方案的共生動力。

第四，重視哈薩克在中亞地區的作用。新時代的來臨，應加強與中亞地區戰略支點的國家合作，發揮中哈合作在中亞地區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中的示範效應。2014 年，前哈薩克總統納紮爾巴耶夫提出了「光明之路新經濟計畫」，兩國政府很快就發表了對接「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光明大道新經濟計畫」的共同聲明。中-哈兩國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大。兩國應不斷探索合作的新方式，拓寬合作領域。做好「絲綢之路經濟帶」和「光明大道新經濟計畫」的戰略對接，這需要中-哈雙方共同努力，大力推進創新，坐實合作項目實施的基礎，才能使合作項目落地生根，發揮其應有作用。中-哈現有的經濟合作，主要集中在礦產資源的開發、油氣管道等，雙方現共同關注的能源領域，其經營主體是雙方的國有企業或控股企業。在更為廣泛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光明大道新經濟計畫」戰略內容合作下，可促進雙方主要的基礎設施建設，如與此相關的水泥、石化、設備製造、鋼鐵、機械等行業，哈薩克在這些領域發展不足，可有著很大的增長空間，也意味著有很大的利益空間。中-哈兩國在進行戰略對接時，更應加強政府引導，並建立起一定的制度保障，可吸引更多的經營主體參與，尤其以私營企業參與到這些產業發展更為重要，從而擴大資金來及從根本上推動經濟結構轉型，促進企業發展與創造就業。哈薩克是中亞地區最大的經濟體，也是「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戰略支點國家，中-哈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對於中國大陸與中亞地區其他國家的合作，具有示範作用。

第五，發展對中亞國家的人文與公共外交。中國大陸應落實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社會、民意基礎，做好「人」的工作。近年來，中國大陸通過擴展，已與中亞國家雙邊或多邊人文合作進行交流，促進了中亞國家地區人民認識中國大陸，培養了一批友華人士，這有助於改善中國大陸在中亞地區的國家形象，提升軟實力。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社會基礎，要求加大公共和人文外交的力度和廣度。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大政策宣傳，宣傳中國大陸「合作型地緣經濟」的

DOI:10.6814/NCCU202001412

理念和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及實現路徑與效果。其次是拓寬人文交流合作管道，推動人文合作模式多樣化。支持新聞媒體與社會文化團體等，鼓勵中國大陸企業在展開經濟行為的當下，多關注當地公益事業和社會發展，塑造中國大陸企業、產品的良好形象。最後還可鼓勵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學校、智庫等機構，參與中亞國家教育機構的建立，以長期合作的交流機制，開展科研專案合作、聯合培養、師生互換等，尤其注重各領域間專家的對話與交流，為各自國家制定相關政策。

總之，中國大陸對中亞的軟實力外交，擁有主、客體、路徑和話語四大要素，在實踐中可不斷走向成熟。現中國大陸和中亞諸國同為發展中國家，擁有相似的經濟發展路徑，但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和宗教信仰等差異較大。未來，中國大陸在中亞的軟實力外交，應充分注意中亞各國的差異性，在「主體整合」、「客體選擇」、「路徑創新」和「話語構建」等方面，充分利用好組合拳，以民心相通為目標，佐以「一帶一路」為手段，政策溝通為保障，上海合作組織為載體，增強中國大陸文化的親和力，中國大陸發展模式的吸引力和中國大陸政治的影響力。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412

陸、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專書

李希霍芬，「中國」，第 1 卷(Ferdinand Richthofen, China, Vol. L,，Einleitender Teil, Rei-mer, 1877)。
司馬遷，「史記・大宛列傳」。
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中華書局，2009 年 8 月 1 日。
張昭遠，「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 列傳第一百四十八，西戎·龜茲國。
脫脫，「遼史」卷二《太祖紀下》，中華書局，1974 年。
閏國疆，「蒙元初期的絲綢之路與國家治理」，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 年 4 月。
王治來，「中亞通史，古代卷(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 年。
馬建春，「元代東遷西域人及其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 年。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中國外交部，2015 年 10 月 3 日。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中國外交部，2015 年 10 月 3 日。
2016 年全球經濟回顧與 2017 年展望」，兆豐國際商業銀行，2017 年 2 月 18 日。
倪健民，「國家能源安全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 7 月。
張文木，「世界地緣政治中的中國大陸國家安源利益分析」，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
查道炯，「中國石油安全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當代世界出版社，2005 年版。

期刊論文

黃介正，「歐巴馬亞洲行與美國亞太戰略轉型」，**展望與探索**，第 7 卷，第 12 期(2009 年 12 月)，頁 1。
陳俊瑞，「中國大陸石油安全問題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44。
石洪濤，「中國的“麻六甲困局”」，**中國青年報**，2004 年 6 月 15 日，第 1 版。
郭博堯，「中國大陸石油安全戰略的轉折」，**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2004 年 8 月 10 日），頁 5。
何希泉，「中亞變局中的民族宗教問題」，**現代國際關係**，2005 年 2 月，頁 15。
陳聯璧「中亞五國的民族關係問題」，**世界民族**，2001 年 2 月，頁 31-32。
張娜，吳良全「費爾幹納盆地的飛地問題——對 20 世紀 20-30 年代中亞地區民族-國家劃界的反思」，**世界民族**，2013 年 1 月，頁 30。
楊恕，王婷婷「中亞水資源爭議及其對國家間關係的影響」，**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 5 月，頁 53-54。
陳俊瑞，「中國大陸石油安全問題之探討」，**展望與探索**，第 4 卷，第 3 期(2006 年 3 月)，頁 44。

DOI:10.6814/NCCU202001412

任重遠，「中國能源安全的目標導向評估」，**國際石油經濟**，2017 年 10 月 31 日，頁 29。
程中海，「中國石油進口貿易的時空格局、發展困境與趨勢展望」，**經濟地理**，第 39 卷第 2 期，2019 年 2 月，頁 2。
郝麗莎，「非洲在世界石油供給格局的地位演變」，**地理研究**，2012 年 3 月，頁 507-520。
鄧富華，「一帶一路倡議下中國石油進口貿易效率及潛力研究」，**重慶人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5 卷第 5 期，2019 年 5 月，頁 27。
蔡玲，「發展石油期貨市場爭奪石油定價權」，**中國對外貿易**，2008 年 7 月，頁 86-87。
陳聯壁，「中亞五國的民族關係問題」，**世界民族**，2001 年 2 月，頁 31-32。
譚建生，「從能源資本認識“四個革命、一個合作”重大戰略思想」，**人民網**，2019 年 8 月 9 日，頁 1。
朱雄關，「絲之路經濟帶戰略中的中俄能源合作新機遇」，**思想戰線**，2015 年，第 3 期，頁 120-122。
黃偉，「哈薩克石油天然氣工業發展現狀及展望」，**天然氣與石油**，2015 年 3 月，第 2 期，頁 1-8。
連輯，范鵬，段建玲，「一帶一路戰略導讀」，**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 年，頁 59-72。
白永秀，王頌吉，「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縱深背景與地緣戰略」，**改革**，2014 年 3 月，頁 71-73。
胡鞍鋼，馬偉，都一龍，「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內涵、定位和實現路徑」，**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 2 月，頁 4-5。
馬莉莉，任保平，「絲綢之路經濟帶發展報告 2014」，北京，**中國大陸經濟出版社**，2014 年，頁 17-23。
王志遠，「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國際背景、空問延伸與戰略內涵」，**東北亞論壇**，2015 年 5 月，頁 31-34。
杜德斌，馬亞華，「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復興的地緣大戰略」，**地理研究**，2015 年 6 月，頁 1006。
鄒嘉齡等，「中國大陸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格局及其經濟貢獻」，**地理科學進展**，2015 年 5 月，頁 598-605。
惠甯，楊世迪，「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內涵界定、合作內容及實現路徑」，**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4 月，頁 63-64。
馮維江，「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分析」，**當代亞太**，2014 年 6 月，頁 73-98。
王海運等，「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背景、潛在挑戰和未來走勢」，**歐亞經濟**，2014 年 4 月，頁 15-16。

DOI:10.6814/NCCU202001412

龐昌偉，「能源合作：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的突破口」，**新疆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 2 月，頁 11-18。
董鎖成等，「一帶一路交通運輸業格局及對策」，**中國大陸科學院院刊**，2016 年 6 月，頁 663-668。
高志剛，「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下中國大陸(新疆)與周邊國家能源與貿易互聯互通研究構想」，**開發研究**，2014 年 1 月，頁 46-50。
薛力，「美國再平衡戰略與中國大陸一帶一路」，**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 年 5 月，頁 56-73。
何茂春，張冀兵，「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國家戰略分析—中國大陸的歷史機遇、潛在挑戰與應對策略」，**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3 年 3 月，頁 10-12。
杜德斌，馬亞華，「一帶一路：中華民族復興的地緣大戰略」，**地理研究**，2015 年 6 月，頁 1008-1010。
薛力等，「一帶一路：中外學者的剖析」，**中國大陸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2017 年，頁 34-35。
楊雷，「美國“新絲綢之路”計畫的實施目標及其國際影響」，新疆社會科學，2012 年第 5 期，頁 70-75.
張迎紅，「歐盟對中亞戰略淺析」，東南亞縱橫，2010 年 12 月，第 12 期，頁 90-94。
李建民，「歐亞經濟聯盟:理想與現實」，「歐亞經濟」，2015 年 3 月，第 03 期，頁 1-64。

學術論文

趙曉佳，「中國與中亞的友好交流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11 年。
Azizi Saeed，「中亞安全對於中國對外政策的重要性,華中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11 年。
王術森，「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主要安全問題研究」，蘭州大學博士論文，2017 年。
張永勝，「論中國對外戰略中的石油問題」，中共中央黨校博士論文，2006 年。
朱雄關，「一帶一路背景下中國與沿線國家能源合作問題研究」，雲南大學博士論文，2016 年。

網際網路

「歷史研究法 historical method」，**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 年 10 月，http://terms.naer.edu.tw/detail/1678683/
「已同中國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一覽」，**中國一帶一路網**，2019 年 4 月 12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tm_id=126&cat_id=10122&info_id=77298

DOI:10.6814/NCCU202001412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晴天社會福利協會，2016 年 8 月 22 日，https://www.sunnyswa.org.tw/12345/189-%E6%96%87%E7%8D%BB%E5%88%86%E6%9E%90%E6%B3%95%EF%BC%88document-analysis%EF%BC%89

Mike Allen, “America’s first Pacific president”, **POLITICO**, Nov., 13, 2009,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09/11/americas-first-pacific-president-029511。

「一帶一路」，維基百科，2019 年 10 月 19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5%B8%A6%E4%B8%80%E8%B7%AF#cite_note-3

「中部崛起戰略」，**MABlib 智庫**·百科，2017 年 1 月 10 日，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8%AD%E9%83%A8%E5%B4%9B%E8%B5%B7%E6%88%98%E7%95%A5

「能源安全遭遇麻六甲困局」（2014 年 6 月 13 日），**人民網**，2016 年 5 月 12 日，http://www.people.com.cn/GB/gouji/14549/2570978html

「中國『珍珠鏈戰略計劃』：租借港口是為了包圍印度？」，**The New Lens 關鍵評論**，2018 年 8 月 12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01529

「反思中亞管道若干問題」，**THE GLOCAL**，2019 年 10 月 21 日，https://theglocalhk.com/%E5%8F%8D%E6%80%9D%E4%B8%AD%E4%BA%9E%E7%AE%A1%E9%81%93%E8%8B%A5%E5%B9%B2%E5%95%8F%E9%A1%8C/

「哈薩克石油明日抵達中國阿拉山口」，**中國評論通訊社**，2006 年 4 月 29 日，http://hk.crntt.com/doc/1001/3/4/0/100134076.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134076

「我國衝破美國阻力 中哈石油管道建設重入正軌」，**中國互聯網**，2004 年 9 月，http://www.china.org.cn/chinese/2004/Sep/665071.htm

「已與中國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一覽」，中國一帶一路網，2019 年 4 月 12 日，https://www.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tm_id=126&cat_id=10122&info_id=77298

「東西文化交流古道：絲綢之路 7000 公里」，腾讯科技，2010 年 01 月 20 日，https://tech.qq.com/a/20100120/000365_2.htm

「2019 年全球恐怖主義指數對外發布」，每日頭條，2019 年 11 月 20 日，https://kknews.cc/zh-tw/world/mrjlxvp.html

「全球恐怖主義指數」，維基百科，2019 年 2 月 17 日，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8%E7%90%83%E6%81%90%E6%80%96%E4%B8%BB%E7%BE%A9%E6%8C%87%E6%95%B8

「哈薩克：光明大道計畫」，中亞科技服務中心，2019 年 3 月 21 日，http://zykjfwz.com/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849&id=454

DOI:10.6814/NCCU202001412

「中哈關於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Wikisource，2011 年 6 月 13 日，https://zh.m.wikisource.org/zh-hant/%E4%B8%AD%E5%93%88%E5%85%B3%E4%BA%8E%E5%8F%91%E5%B1%95%E5%85%A8%E9%9D%A2%E6%88%98%E7%95%A5%E4%BC%99%E4%BC%B4%E5%85%B3%E7%B3%BB%E7%9A%84%E8%81%94%E5%90%88%E5%A3%B0%E6%98%8E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共和國聯合聲明」，中國外交部，2019 年 9 月 12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1179_674909/t1697207.shtml

巴殿君，「一帶一路，小能高估風險也小能無限誇大作用」，中國大陸網，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 一 2_142792.htm1

邵峰，「推進一帶一路，既小能無所顧忌也小能因噎廢食」，中國大陸網，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 一 0_145220.htm1

英文部份

期刊論文

Antonina Habova,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hina's Marshall plan, pivot to Eurasia or China's way of foreign policy”, KSI Transactions on KNOWLEDGE SOCIETY, 2015, PP. 65~70.

Christine R. Guluzian, “Making Inroads: China's New Silk Road Initiative”, Cato Journal, 2017, PP.135~147.

Frank Umbach, “Roundtable: Securing Energy-China's Policy and its Wider Strategic Implications", the Policy Planning Department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 and the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GAP), Berlin, 19-20 May,2003.

Hongzhou Zhang. Building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Challenges in Central Asia [J]. Cambridge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 2015.10.3, p.17.

Hong L, Lin S X. “Do emerging markets matter in the world oil pricing system? Evidence of imported crude by China and India”, Energy Policy, August 2011, pp. 624-630。

John Wong, “Reviving the ancient Silk Road: China's new economic diplomacy”, East Asian Policy, 2014, PP.5~15.

Mike Allen, “America’s first Pacific president”, POLITICO, Nov., 13, 2009, http://www.politico.com/story/2009/11/americas-first-pacific-president-029511。

Michael M. Du.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Context, Focus, Institutions, and Implic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Global Governance, 2016, PP. 30~43.

Robert Wihtol, “Beijing's Challenge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Architecture”, Georgetown

DOI:10.6814/NCCU202001412

Journal of Asian Affairs, 2015.
Theresa Fallon, “The New Silk Road: Xi Jinping's Grand Strategy for Eurasia”,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2015, pp. 140~147.
Tatyana V. Kolpakova and Tatiana N. Kuchinskaya, “China's New Regionalism as a Mechanism to Strengthen the Influence of China in the Global Integration Processes: An Example of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Issues, 2015, PP.109~115.
Timur Dadabaev, “Silk Road" as foreign policy discours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Japanese and Korean engagement strategies in Central Asia”, 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 2017.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Washington D.C.: U.S. DoD, 2012), p.2.
William A. Callahan,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New Eurasian Order”,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PP. 1~4.
Wolfgang Lehmacher and Victor Padilla-Taylor, “The New Silk Road-Idea and Concept”, ISPSW Strategy Series: Focus on Defens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5, P.4.

網際網路

IEA(2010), Oil Market Report, Aug. 11, 2010。
Marlene Laruelle, “The Chinese Silk Road and their Reception in Central Asia”, Testimony before the 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Hearing on "Looking West: China and Central Asia", http://www. uscc. gov/sites/default/files/Laruelle07o 20Testimony_3.
Richard W. “The underappreciated China-Kazakhstan partnership”, May 5 2017, http://www.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the-underappreciated-china-kazakhstan-partnership/.

國立政治大學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DOI:10.6814/NCCU202001412